

中华 公益

CHINA PHILANTHROPY

2013年第3期 | 总第3期

主办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单位 南京市慈善总会

2013社工毕业生去向调查
政府退出募捐是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
聚焦社会组织
王名：公民社会离社会主义其实很近
黄如论：中国卡耐基的朴素逻辑

封面故事：

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米贝乡烂泥村小学的46位孩子，收到了新学期的第一份礼物——由好豆网捐赠的1万份免费午餐。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成立于2011年5月23日，由我国著名慈善家与企业家、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暨河仁慈善基金会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基础上捐建而成，统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暨河仁社会慈善学院，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院系之一，同时也是河仁慈善基金会的专门教育研究机构。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依托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办学基础，同时汇聚公益、教育、政府、企业及其他各界的力量，致力于公益慈善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公益咨询、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工作，着力促进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是我国高校首家设立的支持性公益教育研究机构。

目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暨河仁社会慈善学院已经在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与博士点（DSW）下增设公益慈善研究方向，并在社会工作本科阶段增设公益慈善专业课程，同时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从事公益慈善研究工作，以培养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全系列公益慈善高级专门人才。

河仁社会慈善学院自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开设河仁慈善工作坊，定期组织师生进行专题研讨，举办河仁慈善论坛，邀请海内外公益慈善界的专家学者与公益慈善领袖登台演讲，2012年9月22-23日与河仁慈善基金会、上海增爱基金会、江苏省慈善总会联手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京）公益事业发展论坛》等。



中华公益 CHINA PHILANTHROPY

2013年第3期 | 总第3期

主办单位

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南京市慈善总会

名誉主编

曹德旺

主编

周晓虹 李杏生

副主编

陈友华 方长春 陈斌

执行主编

洪潇 周俊英 王晓雯

出版时间

2013年9月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河仁楼251室，210023

电话：025-89680964

邮箱：hrca@nju.edu.cn

网站：http://sociology.nju.edu.cn

目录 | Content

纪实 | Report

- 1 北流：一个县级市的民间“慈善经”
- 3 2013社工毕业生去向调查：仅少数愿留公益行业
- 7 “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公益活动揭开帷幕
- 12 希望公众也能跟上公益改革
- 13 政府退出募捐是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

聚焦 | Focus

社会组织专题

- 15 计划经济难容社会组织生长
- 20 社会组织盼政府购买过程透明
- 23 社会组织如何应对捐赠落差
- 27 我国民间组织与建设美丽中国

观点 | View

- 31 王名 公民社会离社会主义其实很近
- 36 冯仑 做公益不是威逼利诱
- 39 朱健刚 构建公民社会的关键
- 45 乔木 中国NGO的困境
- 47 周俊英 从恒天然事件看企业社会责任

人物 | Figure

- 51 黄如论：中国卡耐基的朴素逻辑

机构 | Organization

- 57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声音 | Voice

- 63 各方言论

指数 | Index

- 65 中基透明指数FTI排行榜2013年7月20日 top25
- 67 2012胡润中国百富榜 top40

北流：一个县级市的民间“慈善经”

多年来北流市不断优化政策措施扶持工商业发展，已形成重商、敬商、扶商的良好氛围。这种尊重、扶持与信任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主动承担起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

作者_张周来 延焱 来源_新华网

广西民间捐资助学最多的县市、广西首个民间募资建设的公园、广西规模最大的见义勇为基金会、全国第一个乡镇级慈善机构……在民间慈善普遍遭遇信任危机、陷入困境的当下，广西北流这个桂东南部县级市，却把民间公益慈善做得风生水起。

没有十大富豪 有前五的慈善企业家

北流市素有经商传统，仅北流在外经商人士创业总会就有1500多名会员，主要集中在南宁、广州、东莞、深圳等地。如今，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成为了北流公益慈善事业的主力军，他们发家致富后不忘回馈家乡，多年来频频资助家乡修桥铺路、捐资助学、敬老助孤等。

广西老田瓷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田振华就是其中的一位。“富有是北流人从饥饿中拼出来的。”清塘放鱼是他小时候最为盼望的事，因为终于可以有鱼吃。从贫到富，田振华心怀感恩：“我们能有今天得益于国家改革发展，得益于政府支持。”

在北流，大批企业家的财富观令人

印象深刻。田振华的子女要用老爸的钱需要按银行利率“贷款”；女儿假期在他的企业打工，每个月到人事处结算1200元的工资。他说：“把过多的财富留给孩子，对孩子是一种负担。”

财富观的巨大改变，使得企业家不再把巨额财富存进银行，留予子孙，而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多年来北流市不断优化政策措施扶持工商业发展，已形成重商、敬商、扶商的良好氛围。这种尊重、扶持与信任使得越来越多企业家主动承担起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

“可能广西的十大富豪不在北流，但做善事的前五位企业家却在北流，”北流市委宣传部长罗铭进说，“现在北流的企业家基本上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不能让他们的一代睡在甜窝里，不要成为富二代，要成为创二代。”

全民参与 爱心社会薪火相传

企业家的全情参与，带动了普通民众参与慈善公益的热情。北流市民乐镇罗政村就是一个全民参与公益的典型。眼下的罗政村，整洁干净的村道两旁桂圆低垂，一座座农院掩映于果林里，院

中有果，果林藏院，相映成趣。

民乐镇党委书记温道钟介绍，1999年以前罗政村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罗政村是全镇17个村里最差的一个，是唯一没有办公楼的行政村，村里欠债将近140多万，全村没有一条硬化路。”

罗政村党总支部书记钟耀荣放下自己的苗木生意，站出来无偿支持贫困户果苗1.7万株，发动村民们开始义务投工投工进行建设。为了给村里建文化广场，一些村民主动无偿让出了自己的田地、房屋，出让最大的一户达0.7亩。为了获得建筑材料，村民们天不亮就要起床，带午饭去30公里以外的容县去捡风景石、鹅卵石。就是靠着每个人这样一点一滴的公益积累，环村道路、文化广场、办公大楼逐渐建了起来。如今，村里还有一支由30多位老人自愿组建的义务清扫工作队。

浓厚的公益慈善氛围也感染年轻的学生们。北流市助学协会自2007年成立至今，共资助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大学新生超过19600人次，发放助学金累计达1730万元。让基金理事黄战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受助大学生组成了心行乐公益团队，每逢假期都要举行义诊、义演及高考交流会等活动，用自己的点滴奉献令慈善事业薪火相传。

健全捐助体系 激发公益正能量

受爱心感召激励，目前北流市已形成特有的“好人社会”氛围，一批先进人物典型收到当地群众推崇：残疾人谭宝新7年间舍身从水里救起6条生命；年仅31岁的“最美农民”谢强华勇救落水少年不幸遇难；“最美乡村教师”黄业

珍一人坚守山区学校奉献28年……

为了集合企业家的力量，也为了进一步完善捐助体系，激发民众做慈善的持久热情，今年1月北流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挂牌成立，到目前基金会共获认捐善款达5320多万元，到位资金已达3200多万元。

基金会秘书长何海生介绍，他们的基金会与“诺贝尔奖金”制度接轨，5000万元的本金永远保留在基金会，每年用本金获得的利润用作善款。本金增值收益的30%由基金会安排捐赠，70%的收益由捐赠者安排受赠对象。所有善款的去处捐赠者不仅可以查看流向，还有一定的决定权。

何海生说，基金会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救助请求，但需要联合政府相关部门，例如残联、妇联、教育局等等才能完成审查工作，工作非常繁杂。据记者了解，基金会只有会计和出纳两名员工领取工资，其他工作人员全部都是义务参与管理。

罗铭进说：“按着国家相关规定，基金会收益的10%可以用作日常管理与办公费用，但这个基金会却把这个标准降低在3%。”

基金会要想长远的发展，必须要和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罗铭进谈到：

“政府对于基金会只是引导、规范、服务的作用，绝不插手基金会的管理事务，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基金会的独立性和公信力，基金会致力于公益慈善的恒心不变、爱心不变、决心不变。”（[网址链接](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3-08/02/c_116792703.htm) http://www.gx.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3-08/02/c_116792703.htm, 2013-8-2)

2013社工毕业生去向调查 仅少数愿留公益行业

新兴专业竞争压力确实不大，但社会认可度较低，相对而言，行业内能够接受专业人才的渠道还没有建立得很完善，没有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作者_未知 来源_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网站

2013届的毕业生已经离开学校一个月，在传说中的最难就业年，社工专业学生的去向值得关注。记者在对多位学生和社工机构的走访中发现，由于行业发展环境、专业的大众认可度等原因，选择留在社工或公益行业的学生仍是少数，但是留下来的这部分毕业生，如果对工作地点不太挑剔，要在行业内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并不是那么难。

■毕业去向 选择再深造？

中央民族大学社工专业本科毕业 石力文（方向：香港中文大学社工专业读研）

随着社工行业的发展，不少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招收本科生和硕士生。中央民族大学也不例外，今年，该校的第一届社工专业本科生顺利毕业，走出校门。

石力文是广东人，原来读社会学，觉得太过理论化。第二年学校开设社会

工作专业时，邀请了多位业内人士，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社工系主任来做讲座，让学生了解社会工作，最终让石力文选择了这个专业。

据石力文的了解，同班的35位同学中，目前还在社工行业内的，不超过10个，其中包括继续读社工专业研究生的同学。其他人则去往了银行、房地产公司、机关等。没有留在社工行业内，待遇低和社会认可度低是两个主要原因。由于对社工仍有兴趣，并且觉得需要继续学习和接受一些更有实践性的锻炼，她选择前往香港中文大学社工专业读研，也希望自己以后继续从事社工这个职业。

通过4年的学习，石力文对社工的专业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她认为，要做专业社工，尤其是在大陆做还是有些难的。“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做的都是围绕人或者群体本身的需求，比如老年人、青少年，这些人的特点很容易有同一性。但在中国大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都有不同的特点，很难



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的学生走进云南路社区开展“抗逆小童星”项目

用同一个模式进行干预。比如民族社会工作，其他城市社区可能没有。”除了人群更复杂，行业发展程度也是一个原因。石力文认为，“在社工比较成熟的城市，他们制定方案、联系资源的渠道有很多，效率也会很高。但在内地，发展程度低，认知度低，比如对家庭暴力的干预，对方没有接触过社工，可能不会认同，也很难获得开展工作所需要的支持性资源。”

对比北京和广东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石力文说，北京有很多知识分子和有热情的年轻人，他们创办的很多NGO，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社会服务。但机构的专业性一般，每个机构所承担的角色，选择的工作方向和范围是随机性的，缺少更高层面的调控，有些无序。这种情况在广东会好很多，政府有比较系统的调控和支持，薪金也较为合理。

在读大学之前，石力文也不知道社工这个专业，那时广东的社工机构也不多，但就在这几年间发展得很快，“我家所在的社区也有专门的社会服务中

心，请社工专业的学生来工作。现在跟别人说到我读社工专业时，已经有很多人知道，尤其是年轻人。”

还是当社工？

中央民族大学社工专业本科毕业 田俊（方向：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专职社工）

田俊是一个喜欢思考的男生，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社会学，第二年学校开设社工专业，他选择了这个更倾向务实的学科作为以后的发展方向。临近毕业，田俊也在北京寻找过社工相关的工作，但机构给出的待遇都较低，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4月20日雅安地震后，田俊加入在震区开展工作的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做志愿者，后来便申请成为了机构的专职社工，直到现在还忙碌在震后重建工作中。田俊说，毕业刚刚一个月，还没有完全从学生的角色中走出来，但实实在在的震区工作已经给自己带来了转变和思考，能帮助别人让他感觉很开心。

机构现在的活动主要在农村地区，工资跟在北京差不多，但消费水平相对较低，而且管食宿，每月基本生活之外还有些剩余。但问到社工这个职业本身是否让他觉得有成就感时，他说这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成为公务员？

北京师范大学社工专业研究生毕业生刘姣姣（方向：政府机构工作）

填写志愿前，刘姣姣咨询了老师和已经读大学的朋友，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新兴专业，看好它的潜力，觉得以后就业压力不会像热门的法律、计算机等专业那么大，并且这个学科接触到社会学、政治学和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学科架构看上去很不错。

但是研究生毕业时发现，“就业还是躲不过的坎儿。”刘姣姣说，新兴专业竞争压力确实不大，但社会认可度较低，相对而言，行业内能够接受专业人才的渠道还没有建立得很完善，没有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应用型工作是比较难的。

找工作时，刘姣姣也想去社工行业，她分析，社工专业毕业后有几个选择：社会工作机构，如NGO或其他一些公益组织；体制内的社区工作者、公务员中针对社会工作专业招聘的岗位；进入高校做社工教育工作也是选择之一，因为在行业发展初期，需要很多人才支持学科发展。但今年普遍就业困难的情况下，高校教师需求缩水，且更倾向于招聘有香港、台湾或海外学习经历的人，而北京一些区县今年未对外招聘社区工

作者岗位，或未对外地户籍学生开放。

参加公益领域的招聘会时则因为两种情况被阻。一是待遇太差，无法在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立足。二是去不了自己心仪的机构，社会服务机构更倾向于从长期或短期参与过自己活动的学生志愿者中选择，而不是毕业季投一份简历的学生。在多个渠道没有走通的情况下，刘姣姣选择了其他行业就业。

干脆去企业？

北京师范大学社工专业研究生毕业生卢湾湾（方向：私企工作）

卢湾湾本科阶段在华北电力大学读的也是社工，但是调剂到这个专业的。与本次采访中的所有同学一样，她在报志愿之前并不知道社工这个专业。

卢湾湾说，本科时对社工的概念认识得比较浅显，实践也不多，大一到大三期间都是零零散散的活动，大四时才到医院做过两个月服务精神疾病患者的工作。真正认识和参与专业的社工工作，是在研究生阶段。从研一下学期到研二，她一直在服务建筑工人的“一砖一瓦”做志愿者，本来已做好了毕业后去那里工作的准备，后来还是因为家人的反对而作罢。卢湾湾家在河南农村，家人并不理解社工是做什么的，在经过卢湾湾简单解释是做慈善、做好事之后，他们不太同意，在传统观念里，慈善、助人还是有钱人做的事情。

对于以后的工作，卢湾湾说肯定要回到家乡的，但在一个中小城镇中，没有NGO，也没有从事社工专业工作的环境。所以有些后悔留在北京的这几年没有做社工。然而现在的工作每天在进

行，要改变也不易。对于她来说，有时候就像被生活推着走，做选择也身不由己。

一起读书的同学中，留在这个行业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卢湾湾还是觉得读了这几年的社工专业很值，觉得帮助人的时候内心的满足感是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只不过现在在各种诱惑之下，我选择了把家人的意见和工资放在第一位。”卢湾湾说，“也有同学谈起过不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公益慈善的大环境不好，并且存在信任危机，公众对公益的认识不清楚，对公益从业者的劳动价值不认可。”

■观点

期望学校加强社工实操

深圳壹家亲社工服务中心负责人 许礼鹏

壹家亲是一家成立将近两年的社工机构，因为项目需要，今年新招聘了十多位社工专业毕业生，大都来自南方的高校，本科生和专科生各占一半。招聘是在2月份到4月份进行，难度有些大，当时项目开展需要人手，但学校不放人或者学生不能离校，所以就招聘了部分大专学生。许礼鹏说，专科的学生也很好，他们比较珍惜工作机会，一上岗就很投入地工作，也容易跟别人打交道，本科生的理论功底则更好一点，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

他认为，在广州、深圳等地，学生要找对口工作不难。这边的机构所承担的一个人的成本大约在4700元左右，扣掉社保约有4000元，这几乎相当于北京社工平均水平的两倍。“我们在南

京也有机构，那边每人3000元，社保包含在内，这在周边来说已经是较高的水平。”许礼鹏说。

当记者问到学生在学校所受的培养是否能满足工作需要时，许礼鹏表示，他对学校的教育抱有更多的期望，现在专业理论课程没什么缺点，但有些学校的实操不够多，学生处理公共关系，也就是跟居民、服务对象、志愿者建立关系和打交道的能力很重要，这点可能是被忽略掉的。

愿意对口就业的学生数量不能满足需求

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负责人 矫杨

对于社工专业学生的流向，矫杨分析，真正特别想做社工的学生，会考虑去南方，那边待遇比较高，专业机构也比较成熟。但学院都是女孩子，有些家在北方，家里不愿意让她离开太远，就会留在北京等地就业。“今年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数据还要等几个月，所以具体的情况还没有。”矫杨说，“但今年的社区工作者，基本上没有开放给外地生源。”这是学生在北京就业的困难之一。

从整体情况分析，矫杨认为，社会对社工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很多各地的事务所来学校招聘学生做社工。去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会员学校有300所，也就是开设社工专业的学校。“我觉得愿意选择社工岗位就业的毕业生数量，应该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网址链接](http://www.gdshjs.org/s/2013-08/07/content_75705558.htm) http://www.gdshjs.org/s/2013-08/07/content_75705558.htm, 2013-8-7）

“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公益活动揭开帷幕

通过拍摄纪录片，选拔赛还有后期的新闻发布会、慈善晚会等走近留守儿童，最终目标是通过纪录片为湖南留守儿童筹集善款，为他们建造可与父母视频通话的多媒体梦想中心。”

作者_邵兰莹 肖陈铭 来源_TOM娱乐

盛夏，当我们大多数人享受着室内的空调，不肯在户外多走几步的时候；当我们对拥有的关爱和舒适环境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失去的是一颗关爱他人和慈善的心。

有这样一群可爱的人，40度的高温，当很多人都在家中躲避酷暑的时候，他们正奔赴远方付出炽热的爱心。7月29日的上海40.6度，创140年以来高温纪录！酷暑下，在中午气温最高时，从上海辗转至湖南常德桃园，只为在当地拍摄一部关于留守儿童的爱心纪录片，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

他们是“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公益活动的先行军，由活动发起人中国知名东方舞舞者、教练及评委，灵思洁境舞蹈俱乐部负责人思洁和导演组、摄制组及新闻组等组成爱心团体，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向大家奉献一部关爱留守儿童的主题纪录片《一棵绿豆芽的故事》（拟名）。

一部有爱的纪录片仅仅是揭开了一系列爱心大行动的序幕，通过拍摄纪录片，选拔赛还有后期的新闻发布会、慈善晚会等走近留守儿童，最终目标是通过纪录片为湖南留守儿童筹集善款，为他们建造可与父母视频通话的多媒体梦想中心。

从7月29日到9月1日，这部关于爱的“人间爱心大片”正式推出！

含泪桃源拍摄行

当他们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时，父母就远离家乡，到外地谋生；当别的孩子享受花样年华，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们被留在家乡，由年迈的爷爷奶奶陪伴成长。这群孩子，离开了父母亲情的怀抱，独自感受着与年纪不相符的孤独。人们给这群孩子起了一个酸楚的名字：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长期隅居农村，看似与我们毫不相干，可是谁又能无视他们的存在和将来对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成长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与帮助。本次关爱留守

儿童主题纪录片《一刻绿豆芽的故事》（拟名）就是由“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发起人、导演组、摄制组、新闻组组成的爱心团体共同参与拍摄。

下午五点左右，飞机停落在常德桃源机场，憨厚瘦弱的幼儿园长开车来已守候多时了。一行人没做停留，直奔拍摄地桃源市新苗幼儿园。新闻组肖陈铭说，从机场到新苗幼儿园的路上，天好蓝，空气清新心情舒畅。路两边漫眼绿色，思洁说：这绿色是有灵魂的。这绿色是融入了她浓浓的乡情以及对这里留守儿童的殷切关怀之情。抵达新苗幼儿园，下午五点多的天依然阳光猛烈，热浪滚滚！但喝了点水，摄制组立马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周方导演说他不是来度假的。拍摄助理小姚，被称为摄影组的小帅哥，但比外貌更帅气的，是摄制组共有的一颗公益的心。共青团桃源县委书记不辞辛劳，与周导商谈关爱行接洽事宜。

当天深夜，主创团队仍在讨论明天的拍摄计划。7月30日清晨，主创团队很早就开工。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部分不在家，她们长时间见不到父母亲的面。看到她们那郁郁的神情，惴惴不安的表现，大家心中瞬间波涛汹涌，无端的酸楚油然而生。

在幼儿园，摄制组拍下一个自闭的孩子在教室安静的画画、喝水，即使是同学们在旁边的啧啧赞赏也干扰不了她的世界。一个软骨症的小孩，曾在新苗幼儿园就读四年，新苗幼儿园的刘老师抱了她四年，现已毕业两年，但是她的爷爷去世后没人送她上学，两年来她一直在家跟奶奶在一起，今天再见她，

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以前在幼儿园的笑容，她说她还想来上学。还有一个留守儿童的家庭，爷爷说，孩子天天想着妈妈，可现在，见不着，奶奶就是妈妈！

是什么铸造了这个失乐园，让本是欢乐的童年，布满沉重和阴霾？孩子说，她们渴望在早上起床时，能看到妈妈的关爱的眼神；渴望在摔倒时，看到爸爸伸过来的双手；渴望在做好一个手工后，得到夸奖……

纪录片的主创团队们，并没有只沉浸在伤感的情绪中，而是把这份动力化入到创作激情中。烈日当空下，艺术家们挥汗如雨。在缺少睡眠、高温、高强度的工作下，活动发起人思洁甚至嗓子完全失声，在中午的时候会疲惫地蜷缩在椅子上睡着。爱心团队仅仅希望收获的是内心的满足，孩子的笑容还有朋友们的认同。共青团桃源县委书记高霞携电视台等相关当地媒体，顶着酷暑赴新苗幼儿园，携助拍摄提供支持。主创团队在结束拍摄后和当地镇政府领导座谈，得到多方力量协助，让爱心有更多机会落到实处。

在中国有5800万儿童留守田园，留守儿童的比例占中国农村儿童比例高达28.29%，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80%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70%的父母年均回家不足3次，有的甚至几年才回家1次；近30%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通信频率月均不足1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正是困扰留守儿童的诸多问题，包括生活问题、心理问题、学习问题还有监管问题等，他们也正是让留守儿童在应该纵情欢笑的年纪满眼忧伤的根本



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晚会



纪录片摄制组在湖南常德桃源市新苗幼儿园取景

原因。

为留守儿童留下影像和传递真实的关爱，这也正是留守儿童纪录片拍摄之行的目的，并将正式拉开“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系列行动的序幕。影像中孩子的落寞表情和主创团队关切又劳累的面容，还有归途开心又沉重的心情，此次留守儿童纪录片拍摄之行已经在酷热中结束旅程，而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动还在延续。

做爱心传递的天使

爱心是可以感染人的，也是可以传递的，在“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系列行动中我们感受到这份温暖。

在桃源，有一对70后夫妻，放弃外出高收入打工机会，回到自己家乡为留守儿童们建起了一所幼儿园——新苗幼儿园。没有地，他们把自己家改造成了幼儿园；没有收入，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没有老师，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小学高级教师退休了的母亲前来助阵；没有厨师，父亲放弃所有工作来帮忙……这

个教书世家，本着为留守儿童撑起一片天的情结，几乎付出了全家人所有的心血。近十年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关爱着留守儿童，谱写了人间真情。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建设了新的教室，没有资助，没有收入，有的只是近二十万的欠款。十年艰辛，他们无怨无悔。他们说，只要能让孩子们的情况越来越好，看到这些留守儿童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快乐成长，把他们叫做“爸爸、妈妈”，无论多苦都值得。现在，他们最渴望的是：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多媒体梦想中心，能在提升教学条件的同时，满足留守儿童们与爸爸妈妈视频通话的愿望。

当一份爱心坚持了整整十年光阴，没有收入只有欠款，没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能满足留守儿童一个小小的心愿，这足以让更多的人把爱心传递下去。

邹思洁，湖南常德人，从小学舞，她是“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的发起人。她带领着一群舞者，用优美的

舞姿让欣赏者赞叹舞者的力量，又通过培训让东方舞魅力不断传递。和桃源新苗幼儿园的两位创始人不约而同，她也一直用行动关爱着留守儿童群体，一心想着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为留守儿童做一些事情。几年来，她默默筹备，借力各方资源，自己掏钱办活动，最终把志同道合的舞者联合到一起，参与到“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中。就是这样一个个传递舞者之美的艺术家，舞者美丽的灵魂投入到爱心的传递中。

作为“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的发起人，邹思洁拥有对东方舞的执着和艺术追求，更有对留守儿童的一份爱心和坚持。她的身后，还有上海灵思洁境舞蹈俱乐部、上海灵婧舞社、Bellefashion部落舞蹈工作室、上海莲东方舞工作室等多个演出团体。这是一群真正美丽的舞者。

“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的背后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为掌声，不为收益，不为回报，主动放弃手头的工作与项目，奔走在烈日当空的

夏日，无偿地参与到活动中，只想为远方的留守儿童贡献一份应有的力量，他们是“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的策划执行团队。他，是逸旻文化的周方，此次活动的导演；她，是弘翌文化的蔡亚剑，活动执行导演；他，是梦享文化（连锁工场）的蔡励才，活动总策划及资源整合；他，是影工传媒的何新海，活动纪录片的制作人；她，是活动的策划与推广人，邵兰莹；他，是活动的新闻采集及执行人，肖陈铭；她们，是活动志愿者项目组组长：董英、陆贾美……40度的高温，100分的爱心，支撑他们激情的原动力来自对孩子们质朴的爱，对世间生命的尊重与悲悯情怀；来自他们内心深处存在着的高尚品质，以及大家的共同追求。

把散落的爱心汇聚起来就是大爱，从桃源新苗市幼儿园创始人和活动发起人邹思洁的坚持，到策划团队的资源整合和把活动变成现实，落到实处的爱心总是被人关注。

天使在人间，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他们传递大爱。

东方魅影舞动爱

以拍摄纪录片的形式开启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大门，活动发起人和背后的团队们整合文化资源，亲临现场走进留守儿童，只是实现爱心传递的第一棒，后续活动将陆续展开。

2013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公益活动第一站在湖南常德桃源剪市新苗幼儿园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以公益晚会为平台，旨在关注留守儿童，爱心跨越疆界，点亮孩童希望。剪市镇新苗幼儿园成为此次活动的首批对象。活动发起人邹思洁带领上海东方卫视旅游频道的导演团队一起来到新苗幼儿园，拍摄纪录片《一颗绿豆芽的故事》。

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系列公益活动将以慈善晚会、拍卖酒会为平台，活动门票、拍卖善款及募捐款项将由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统一管理，用于资助建造10万元/间的多媒体梦想中心，让留守儿童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孩子们与爸爸妈妈视频聊天的小小愿望。慈善晚会更将于8月31号在上海宛平剧院开展。纪录片《一颗绿豆芽的故事》将在晚会上进行展播，爱奇艺视频网站也将开设专栏播放。

舞动希望和关爱，为湖南留守儿童筹集善款，建造可与父母视频通话的多媒体梦想中心，这是此次系列关爱慈善活动的实际目的。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处境不仅涉及到个人未来的成长，家庭的幸福，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人才建设。此次活动无疑为当地留守儿童带来福音。上海思

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CEO，从事发展东方舞事业，“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公益活动发起人邹思洁说，与城市的同龄人相比，他们平时不仅缺少父母的关爱，还缺少好的教育资源师资队伍，学习用品、课外读物等更是单调缺乏。她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关注这个社会群体，以自己绵薄的力量为留守儿童谋取福利。

东方魅影舞动爱，爱心慈善事业，不仅需要热泪和爱心，更需要理性的思维和持续的关注。活动发起人邹思洁和她带领的一群舞者们，更有东方魅影·关爱留守儿童慈善公益活动的策划团队，他们正在以坚定的恒心和执行力打开爱心慈善之门，把这个爱心之路一直走下去。（[网址链接](http://post.yule.tom.com/7D001DFD797.html) http://post.yule.tom.com/7D001DFD797.html, 2013-8-7）

希望公众也能跟上公益改革

公益社会的成长，离不开公众支持。但从很大程度上讲，随着公益社会越来越遇上体制的大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公众有耐心，予以更大程度的支援。

作者_寇竹卿 来源_公益周刊

云

南省政府近期邀请全国公益界的人士聚集昆明，就社会改革的对策征集专业意见。公益界人士借这个平台，表达了一些很重要的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政府权力要从募款渠道中撤走，不要搞以权募捐的把戏，尊重公益社会，让它能够自主地培育。

一些媒体报道仍然将焦点放在吸引眼球的信息上，比如汶川地震八成捐款进入政府口袋。这样的新闻，媒体有选择的自由，也特别容易引起读者的怨恨，大家各得其所。可是，真正的问题意识却没有建立起来。

公益社会的成长，离不开公众支持。但从很大程度上讲，随着公益社会越来越遇上体制的大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公众有耐心，予以更大程度的支援。公益多是静态的信息，当然也有丑闻。在公益丑闻吸引了足够多的议论与愤怒之后，要超越就特别困难。

在提倡人人公益的时期，似乎公益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公益界为了一些暂时的目标，也愿意传达这样的观点。尤其在借助社交媒体募款的阶段，这样的

大众公益理念似乎迎合了許多人。这样的做法有正当考虑，可不好的地方是容易给大众造成不那么恰当的印象。前两年发生的慈善界丑闻，让大众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心理。一方面认为公益是很轻易的事业，一方面有认为它是肮脏混乱的。对于丑闻背后的东西，媒体少有揭示与评判，这固然是媒体在新闻选择上的偏见，但也导致民众缺乏对公益进程的人士与掌握。

在这个时候，公益新秩序在艰难形成的过程中，公益界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公权的关系。公益社会主体多样，现实来说，也包括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而处理与它们的关系，方向不一定是排挤它，而是让它们服从游戏规则，公平地进行公益活动。公益界已经意识到这个根本问题。与此相比，所谓放开登记根本就是边缘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公益新秩序，放开登记没有意义。问题在于，公益界的公权势力也认识到它们成为问题，所以两下的对峙状态正在固化。这个时候，特别希望公众跟上公益改革。

（下转14页）

政府退出募捐 是慈善领域的“改革开放”

中国目前的慈善状况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脱节，迫切需要一场改革开放。如果说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的话，那么社会化慈善的主体就应该是社会慈善机构。

作者_未知 来源_华商晨报

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

公共财政与慈善捐款之间界限不明早已有所诟病，最近的一次，红十字会的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就曾抱怨，他称有的政府部门提出将款物交出，红会不愿意交，但“基层红会很弱，很难办”。并以此抱怨红十字会级别太低，这样的抱怨明显是饮鸩止渴，以至于事实也被淹没于指责的口水之中。

这个事实再度浮出水面是因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的一份统计，这份统计称，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不管这个数据是否过于耸人听闻，但政府在慈善中所牵涉的利益关系却是无法回避的，正如曾任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所说，“现在一些地方慈善机

构，成了‘政府的收钱口袋’。”

在这样的现状下，云南省有勇气提出“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难能可贵。难得之处在于，政府、官办慈善机构、捐款人之间的利益铁三角已经形成，作为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如果不是对自身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很难做到这一步。可贵之处在于，这种充满勇气的自我改革让中国慈善有了走出当下危机的出路。

毋须讳言，中国的慈善事业正遭遇一场危机，有人将一切归咎为“郭美美”，还有人说这是一场信任危机，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行政化慈善机构的操作不公开透明备受指责，诸多丑闻层出不穷。然而，事实上，公开透明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慈善领域所经历的是一场体制性的危机。

我们当下慈善模式还在遵循着计划经济的思维，由行政力量进行慈善资源的生产和分配，慈善的主要力量依旧是政府和事业单位。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脱离

了“单位人”的生存方式，成为“社会人”，但却并没有与他们相适应的慈善体制。他们对旧的、行政化的、计划经济思维的慈善机构不买账，同时旧的慈善模式也无法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慈善力量，也就是说，慈善的生产力被禁锢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慈善状况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脱节，迫切需要一场改革开放。如果说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的话，那么社会化慈善的主体就应该是社会慈善机构，如今的市场经济一样，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慈善事业的守护者，提供监管等公共服务，让社会慈善机构公平竞争，而不是做一个束缚慈善生产力的家长。

云南宣布退出慈善募捐，很有可能成为慈善领域改革开放的先声。改革的是政府在慈善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开放则让社会慈善力量获得生机。只要慈善机构之间能够实现平等竞争，慈善机构公开透明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社会慈善力量的释放带来的将是慈善领域的大繁荣。[（网址链接_http://new.163.com/13/0802/14/959F8UON00014Q4P.html](http://new.163.com/13/0802/14/959F8UON00014Q4P.html), 2013-8-2)◆

（上接12页）

最近半年，公益界所呼吁的，无论是慈善总会回归基金会条例下运作，还是政府不要伸手将捐款作为预算外资金，以及放开募款市场等。莫不是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公益界念兹在兹，尽管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但仍需要公众加入，形成推动公益改革的风潮。

在对公众提出要求时，也当理解公众对公益的冷感。这些冷淡的态度，许多来自于公益社会形成过程中积累的负面影响，因而及时切割公益负面因素，也就相当紧要。此外，公益传播在提炼问题方面，还需要用心，以更紧密的行动与公众站到一起。

我们也愿意展现一个较为复杂的公益场域，希望这种复杂局面不要让公众参与望而却步。公益社会行进到今天，与社会高度契合。公益的面貌取决于社会的面貌，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它。公益何为？答案就在于社会。公众与公益界的联合还可以再次上路。[（网址链接_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8/05/content_1908730.htm](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8/05/content_1908730.htm), 2013-8-5)◆

计划经济难容社会组织生长

作者_徐永光 来源_中国慈善家

2012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在第三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为0.23%，比2011年降低28%，甚至比2007年还低18%。六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家经济份额中的比重不升反降。

据民政部《2012年社会服务统计报告》，2012年，中国社会组织(包括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共计49.9万家。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25.6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231626亿元的比重为0.23%，而2011年这个比重为0.32%，一年内下降了28%。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比重在2009年曾达到0.35%，之后一路下跌，掉到2012年的0.23%，这个数字甚至比2007年的0.28%还要低18%。六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在许多方面有进步和发展，但在国家经济份额中的比重不升反降。

0.23%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不妨做一个国际比较。

据美国国税局于2007年公布的(2004年)估算报告：美国非营利部门正式组织的现金收入为12000多亿美元，这不包括不需要向美国国税局提供990归档年鉴的30万家宗教组织的收入。美国2004年国民生产总值是11.67万亿美元，非营利部门正式组织占美国GDP超过10%(引自《美

国的秘密一个人财富如何改变世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收入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大体上20%来自社会捐赠，30%来自政府补贴，50%来自服务收入，比如私立大学的学费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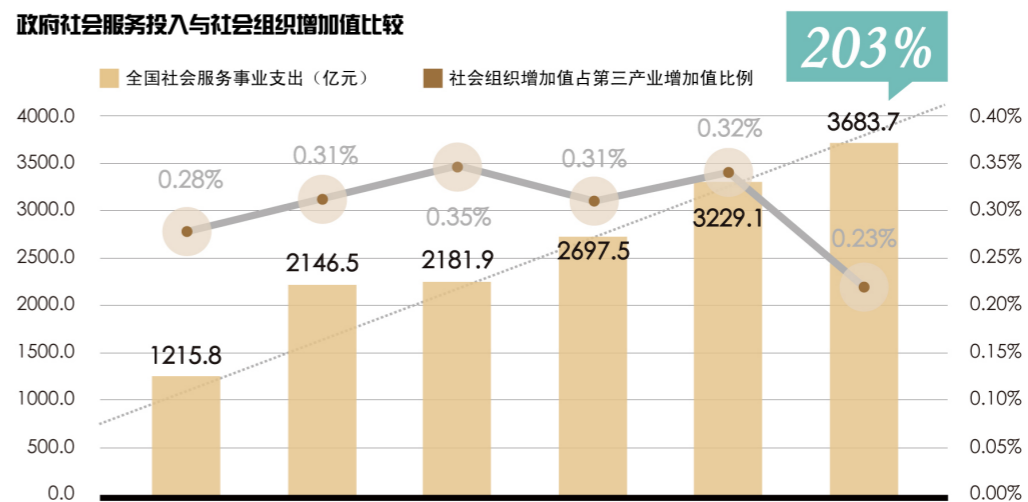
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赛拉蒙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对41个国家(不包括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比较，非营利组织平均占GDP的4.6%，占非农业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

201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19322亿元，社会组织增加值所占比重为0.1%。如此一算，中国社会组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大约为10年前美国的1/100，为20年前全球平均水平的1/46。

规模如此之小的中国社会组织部门在国家经济盘子中的份额还在缩水，令人吃惊和不解。除了从社会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困境(登记注册难)和资源困境(慈善资源被政府和官办慈善组织垄断)上找原因，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社会服务领域计划经济回潮，挤压了社会组织的生长空间。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社会服务领域，国家也曾提出过改革开放的思路。200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

政府社会服务投入与社会组织增加值比较



数据均来源于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针对以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社会特殊困难群体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福利事业“长期以来由国家和集体包办，存在资金不足、福利机构少、服务水平较低等问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福利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需要”，提出“广泛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大力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加快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回顾当时，国家还比较穷，借助社会力量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乃属合乎逻辑的理性选择。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府手里的钱越来越多。从2000年到2012年，全国GDP从99214亿元提高到519322亿元，增长了5.23倍；财政收入从13395亿元提高到117210亿元，增长了8.75倍。国家投入社会服务事业费也在快速增长。同样选取2007年到2012年的数据，全国社会服务事业费支出从1215.5亿元增加到3683.7亿元，增长了203%。

把2007年至2012年政府社会服务投入和社会组织经济数据的变化放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如下曲线：

国家对社会事业投入的增长，很大一部分用于社会救助和防灾减灾，但由政府部门掌握使用的社会服务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也在大幅增加。2012年社会服务事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234.7亿元，是2004年的8.04倍；建设施工项目8958个，比2011年增长32.7%。

残疾人综合服务和体育设施建设更是突飞猛进。据报载，南方一中等城市建一个残疾人体育中心，第一期就投资2.3亿元；北方某计划单列市，市级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占地150—200亩，一期工程投资4.5亿元，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区一级设施投资总额又超过市级。政府建了设施，还要设机构，配备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人员来管理，导致社会事业领域吃皇粮的人员急剧增加。

有民间公益人士称，为残疾人服务

应该进社区、进家庭，现在则是肢残人摇着轮椅、盲人拄着拐杖、智障人由家人陪伴，来到政府5星级服务设施，接受国家工作人员的照料。当然，能得到如此高端服务的只能是少数“明星级残疾人”。

问题是，政府建的许多社会服务设施及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有竞争性，在竞争中，社会组织明显处于劣势。有一家服务智障人的民间机构，维持运转除了靠少许社会捐赠，还需要服务对象家庭承担一定的费用。结果隔壁也开了一家政府供养的同类机构，提供免费服务，迫使这家民间机构只好关门。一些民间养老机构面对公办养老机构，也碰到类似问题，这正是为何40%的民办养老机构亏损的重要原因。

在孤儿救助问题上，国家责任完全被固化为政府包办，而实际上，全国61万孤儿，政府福利院收养的只占1/6。民间爱心人士领养了法律上归政府管而政府没有管的孤残儿童，是大善行为，但按照现行法律却属于“非法”。兰考袁厉害“违法”收养孤儿酿成了惨祸，政府反思的结果却是加大力度整治打击民间“非法”收养，投资建设更多的官办儿童福利院。为什么不能换一个思路：在政府的许可、扶持和监督下，开放民办孤儿院？谁都明白，孤儿除了基本的生活和教育保障，更需要一个妈。让民间献爱，由政府埋单，既省钱，又符合孤儿的最大利益。

最近南京发生两名女童饿死在家中的悲剧，报载有关方面曾向政府福利院求助，而福利院严格执行“只能收养父母双亡的孤儿”的政府规章，将两个孩

子拒之门外。

政府部门习惯于服从上级指令，照章办事，乃至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机关文化。社会组织则是为使命而生，发现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是其存在的价值。如果是民间儿童福利机构，面对儿童求助，不可能推诿塞责。

社会服务领域计划经济思维即全能政府思维，以为政府可以包办一切。用前总理温家宝的话说：“我国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开放仍然相对滞后。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责任不到位和包揽过多同时并存，该管的没有管到位，该放的没有真正放下去”。

在计划经济思维下，慈善捐款也成了“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慈善捐款本来就少，其占GDP的比重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而这一点捐款大部分还流向了政府部门以及有政府背景的3000多家红十字会、1900多家慈善会和1300多家公募基金会。据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信息中心报告：“2010年中国近6成捐款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会系统中，只有1.3%的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福利院”。资源垄断让那些没有政府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难为无米之炊，处于极度饥渴状态，遑论健康成长。

即便在社会组织如此之低的增加值中，官民不分的部分还占据了大头。社会组织增加值比重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流向政府项目的捐款，统计增加值时无法反映在社会组织头上。反过来，如果捐款由社会组织来操作落实，用于社会

组织的项目和服务，不仅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还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归属于社会组织的GDP。正如2000年国务院文件中指出的“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世界各国都是政府出钱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唯独中国是民间出钱、政府干活。有人为此辩解：社会组织做公益和政府做公益都是为人民服务，政府有何不可？

笔者曾在《慈善体制改革也需要顶层设计》一文中，对此做过解释。民间公益和政府公益都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其运作机制和投入模式则存在重大差异：政府公益用的是财政税收的钱，民间公益用的是民间捐款或服务收入；政府可以拿财政的钱购买民间公益组织的公共服务，但不能把民间慈善捐款当成“第二税源”，用来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政府公益的投入带有强制性、垄断性和普惠性，民间公益的投入带有自愿性、竞争性和差异性；政府要制定法规政策支持民间公益的独立发展，并担负监管的责任，而不应自己操盘，既当规则制定者，又当运动员，还当裁判员。

社会服务领域计划经济的特点是：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税收，还以民间捐款作为补充；发展模式为垄断性，比较喜欢做形象工程，难免造成资源浪费；服务主体为国家事业单位，由国家供养的人员提供服务，有“铁饭碗”，缺乏竞争，服务质量堪忧。

社会服务社会化的特点是：资金来

源于民间志愿捐赠、政府购买服务和服务营收；服务主体为社会组织（亦包括企业）；发展机制为竞争性，通过市场选择，优胜劣汰。这种模式能提高社会捐赠资金、财政补贴资金和社会投资的效率，激发志愿精神，增加社会资本。

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13日在国务院简政放权、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惠而不费”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的思路。他说：“凡适合市场、社会组织承担的，都可以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办事不养人、不养机构。这样既能加快解决公共服务产品短缺问题，又能形成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对企业、老百姓和政府，都是‘惠而不费’的好事。”

这是中央政府对社会服务领域由计划经济思维走向多元合作、社会化发展新机制的重要指导意见，思路非常清晰。落实的关键是，各级政府愿不愿意放弃与民间抢夺资源，想不想放权，敢不敢在自己身上“割肉”。

当我们听到“社会组织有了长足发展”之类想当然的判断时，不能无视自2009年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在国家的经济份额逐年下降、乃至2012年降到比2007年还低18%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当我们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四类社会组织（即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和城乡社会服务类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政策出台欢欣鼓舞时，务必清醒了解，如果社会服务计划经济思维不改变，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资源供应机制缺失，放开登记又有什么意义？

我国社会组织增加值和慈善捐赠占GDP份额仅有千分之一，且6年来不增反减，离世界的差距在几十倍，不是因为中国人缺少爱心。我曾与世界银行[微博]的前行长沃尔福·威茨先生讨论过中国慈善捐赠的问题。他说：“有一项对美国华人慈善的研究，结论是：华人参与慈善捐赠的热情绝不比其他族裔或宗教信仰的人差”。的确，我们不必从文化差异上寻找中国慈善捐款少的原因，只能从社会组织和慈善事业的法律、政策环境和体制上寻找原因。社会组织与慈善的发展诚如万木生长，我们尚存中华文化的土壤和根，缺少的是阳光、雨露和养分。

在国家政策曙光初露的今天，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突破资源困境已经升至第一要务。这里需要政府行动的部分比较多。首先，在非灾害条件下，政府必须终结权力越位的“以权谋捐”，把属于民间的这一块还给民间。红会、慈善会、公募基金会应把资源优势转变为支持民间公益慈善发展的推动力量，不要让资源垄断继续成为草根NGO的“梦魇”。

非公募基金会因其资金的独立性，在改善慈善生态环境中具有独特的作用，盼有更多的非公募基金会选择资助型发展模式，成为民间公益的资源供应者。资助型是国外基金会的基本模式，而在中国，资助型基金会的数量只能以个位计。

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力度，是建立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助推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一环。建议政府拿出财政专项资金、社会服务

事业费，来采购社会组织服务，而不只停留在彩票公益金分配作秀上；同时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大力发展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的社会服务政社合作模式。

需要警惕的是，采购社会组织服务不如工程招标那样有可检测的刚性指标，既然工程招标还有那么严重的腐败发生，政府采购服务更需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择优购买，并加强监督评估。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的寻租行为，将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后果。这种情况正在一些地方发生，绝不是杞人忧天。

课税制度对于遏制社会组织的发展“功不可没”。要想阻止社会组织在国家经济份额中的比重继续下滑，相比于结束资源垄断和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的措施，修改税制的难度相对较小，且杠杆作用更加明显。鉴于社会组织份额非常小，落实免税政策对于国家10多万亿税收盘子的影响微乎其微，而由此激发出来的社会公益慈善活力、社会爱心和生产力则不可估量。“拔一毛以利天下”，财税部门何乐而不为？（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注：本文有关“社会福利”“社会事业”“社会服务”“公共服务”的概念均来自政府不同文件的表述，意思有同有异。在本文表述的语境中，主要用其相同点，故没有刻意解释或转换。（[网址链接_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30807/164016375851.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30807/164016375851.shtml), 2013-8-7）

社会组织盼政府购买过程透明

作者_未知 来源_京华时报

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会议提出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要规范透明，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规范透明”“刀刃”让不少社会组织心生期待。

此前，随着政府购买力度的逐年增大，虽然不少社会组织从中受益，但多数社会组织表示并不清楚为什么“中选”，如果能详细公示评审过程和成败原因，将有助于推动公益组织自身建设。

社会组织期待了解评审过程

怎么评的，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出结果，都不知道，最后还是兄弟机构告诉我们，说网上看到公示了，我们一去查，才知道申请成功了。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成功申请到政府购买了，虽然屡获政府支持，但红枫的主任吴群芳坦言，“过程不太清楚。”

2011年初，北京市首次发布《北京市2011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

红枫在这年三月开始了申请，项目书等交上去后，是漫长的等待，直到11

月份，结果才出来。

“等待期间发生了什么不清楚，怎么评的，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出结果，都不知道，最后还是兄弟机构告诉我们，说网上看到公示了，我们一去查，才知道申请成功了。”吴群芳说。

对于提交项目书然后直接等结果的这种评选过程，不少公益组织觉得，胜负取决于项目书撰写得好坏，因此被不少人戏称为“项目书写作大赛”。

作为北京市民政局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评审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介绍说，民政局会对申请项目先进行初审，拿掉一些问题较大的申请，然后专家再进行背靠背的打分，最后按分数排行选出项目。

“这个过程本身没问题，但评审过程，好的项目好在哪儿，不好的项目差在哪儿应该给社会组织更多了解的机会，这不仅是透明的问题，本身还是对公益组织自身建设的推动。”李涛说。

枢纽型组织助力政府购买

枢纽型组织帮我们打开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渠道，我们也相信志愿者联合会，但这种要隔着一个平台做事的感觉，许多中间环节会搞不清楚。

1986年，孟维娜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民办特殊教育学校，至今，包括香港在

内，已经有13个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慧灵”在她的推动下成立。

“唯一没有正式身份的就是北京慧灵了。”孟维娜笑道。

目前，北京慧灵仍以工商身份运行。

《北京市2011年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指南》发布后，诸多跟慧灵一样的机构经历了过山车似的心情，因为《指南》明确规定，申报主体须是“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连续两年年检达到合格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这意味着，如北京慧灵这样的工商身份将无缘参与其中。

好在为这些组织留了个空间：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主责单位，负责所联系社会组织申报项目的指导、协调和筛选。

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即是市级“枢纽型”组织，而慧灵正是其会员单位，通过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慧灵获得了申报的机会并取得了成功。

但借助枢纽型组织申报的感觉，让孟维娜觉得无所适从。

“毕竟我们有自己的业务，但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跟我们的业务本身并不搭边，所以这种‘不搭’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无所适从。”孟维娜说。

而项目款拨付也很模糊，北京慧灵需要每星期先自己花钱，然后再去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报销。

“而且，到底申请了多少钱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去年先是说给我们申请下来了6万，后来又来电话，说又多了几万。客观地说，枢纽型组织帮我们打开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渠道，我们也相

信志愿者联合会，但这种要隔着一个平台做事的感觉，许多中间环节会搞不清楚。”孟维娜说。

目前，北京市有两个体系在分别执行政府购买服务，其一是合署办公的北京市社工委与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这个系统管理的是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另一个系统则是北京市民政局，这个系统的资金来源是福利彩票公益金。两个系统在实际运行中各自为政。

李涛乐见这种情况，因为“多一个系统资源，社会组织就可以多一个申请政府购买的渠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认为，枢纽型组织本身就是亟待改革的对象，法律定位不清，身份角色模糊，存在风险。

但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宋贵伦接受《财经》采访时称，枢纽型组织在各自领域占有优势，政治上可靠，经北京市政府授权，可以代行一部分政府职能。

评选监督有待加强

在项目申请阶段，评审专家实地走访了解情况，项目进行时和结束后，询问服务对象服务情况，这才是客观公正的政府购买。”

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逐步制度化成规模之际，业内不少声音指出，要避免政府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名义购买有政府背景的“社会机构”或“团体”的服务，导致“自我圈钱”。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义嘉表示，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偏离公共利益的利益共同体、社

会组织缺乏自主性而成为政府的执行工具等风险正在增大。

“自我圈钱”虽未有实例，但与政府走得较近的社会组织在购买中确实体验了“青眼有加”。

据孟维娜介绍，在全国13家慧灵中，有11家获得了政府购买，其中，6家慧灵搬进了当地残联大楼。

“说实话，我们这些拿到政府购买的，也是不清不白拿到的，虽然我们的工作的确做到位了，影响力也形成了，但也有人骂我们跟政府走得近，因为我们有些领导人的确擅长跟政府打交道，但慧灵绝不允许有灰色交易。”孟维娜希望拿不拿到钱，是根据法律制度来体现，而不是公关。

孟维娜能做的，就是经常提醒这些机构的领导人，一定要真正地服务于社区。

今年评选结果出来后，孟维娜和同事们研究了获选组织的情况，“有些政府自己主管的社会组织一口气拿到十几、二十个项目。”

什么样是客观公正的政府购买？孟维娜以广州慧灵为例，“项目申请阶段，评审专家会实地走访了解情况，项目进行中及结束后，评审团还会给服务对象打电话，询问是否知道机构获得政府购买，服务质量如何，有什么问题，以此来评选及监督获得政府购买的项目。”

从入门到评审增强透明度

如果自己主管的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与民间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发生了重合，我们通常会把项目交给民间社会组

织去做。

在北京社会组织密集的朝阳区，一些渐进式的透明工作正在摸索中。

据朝阳区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社会组织科马凯介绍，每年市级政府购买项目审批结束后，朝阳区会开一个市级项目批复会，告诉申报组织结果。“大部分还会给一个交代，告诉他们哪做得好，哪做得不好。”

而对于不向工商注册的机构开放政府购买的规定，在朝阳区有所松动，“对于没有其他组织能做的项目，也会给工商注册的机构机会。”马凯说。

而对政府背景机构的参选态度，马凯表示“做减法”，“如果自己主管的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与民间社会组织申请的项目发生了重合，我们通常会把项目交给民间社会组织去做。”

除了政府自身的改革探索外，孟维娜还提出香港的“入门防范模式”。

五年前，孟维娜在香港注册慧灵时，被要求签署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声明，声明明确表示不能利用自己的工作背景、社会关系等来为社会组织获得营利性的灰色利益。

“签了这个声明，就意味着你自己的业务不能进入公益机构里，一旦机构被发现获得了与你个人背景相关的利益，就会被严格查处。”孟维娜说，在这种入门声明的威慑下，许多居心不良的人会被“吓”跑。

李涛所在的协作者这几年也连续获得政府购买服务。与往年不同，今年李涛申请的一个社区服务项目被民政部门进行了建议性更改，协作者由向社区提供服务，变成了监测其他（下转26页）

社会组织如何应对捐赠落差

作者_闫冰 张木兰 来源_公益时报

截止到7月28日，壹基金联合救灾已在梅川镇、中寨镇的24个村子、151个社发放了壹基金救援物资。

这是一组数据，来自于“7·22甘肃地震”发生后的第七天。

截至7月29日16时，岷县灾区已接收社会各界捐款668.27万元、物资折价约1.95亿元，定西红十字会已接收全国红十字会系统及社会各界捐赠的抗震救灾物资价值达1139万元。

这是一组数据，来自于“4·20芦山地震”发生后的第七天。

截至4月27日8点02分，根据互联网数据信息整理统计，全国共有115家基金会已参与地震救援和确定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资已达10.49亿元人民币，支出款物合计1.72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扶贫基金会募集2.3亿、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募集1.7亿、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募集1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募集6400万、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募集5100万。

2013年的夏天，前后不过数月两次地震来袭，透过两组不完全统计的数据或可发现，两次地震虽然震级相近，受到的关注却相距甚远。而事实上，此次甘肃受灾地区的救援难度更艰巨。

而另一组可以查到的数据，是截至8

月2日，甘肃省慈善总会收到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1844.95万元，甘肃省红十字会收到捐赠1564.323937万元，甘肃省光彩事业促进会收到捐赠款物合计639.97万元，甘肃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收到捐赠645.85万元(主要来自于全国青基会共同体、团中央、各省团省委等)。

天壤之别的数字背后，是并不乐观的灾情和捐赠热情的下降，面对这些，赶赴灾区一线救援的社会组织面临着一道不小的难题。这其中，也不乏很多基金会一边是手握重金的芦山灾后重建任务，一边是捐赠寥寥的甘肃救灾现状，他们会如何权衡利弊？灾区现在究竟需要什么社会组织做什么？

重重疑问之下，“绝不能浪费捐赠资源。”“钱不是花的越快越好，而是越有效越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接受采访时的话，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这也是很多社会组织目前的共识。

社会捐赠遇冷？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根据甘肃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在前线发回的评估报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紧急拨付400万元在岷县开始援建抗震希望小学，并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资助今



西藏僧人为雅安地震灾区捐款祈福

年刚刚考入二本以上大学的灾区学生。

“有一点顾不上，主要原因是资金少，400万元是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紧急救灾助学的备用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向《公益时报》道出实情，“社会捐赠情况不是太理想，捐赠热情不太高涨。”

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此次情况相同，在芦山地震后收到捐赠额异军突起的壹基金，这次也没有收到太多为甘肃的定向捐赠。

7月28日，距离甘肃岷县漳县6.6级地震过去7天，据不完全统计，壹基金共为此次地震募款300万元左右(其中不包含物资捐赠)。多数善款来源于爱心企业捐赠，个人捐赠数量较少。

壹基金传播部副总监姚遥表示：“与雅安地震并无不同，壹基金所有的公共募款渠道一直保持畅通。”对于公众的反应，他分析因为刚刚经历了一场阵痛，这次地震对于公众的“刺激”没那么强烈。“包括媒体在内，关注度也不高。”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认为，这次的社会氛围也不相同，“这次地震发生后，不像雅安地震的时候，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各大媒体集中报道灾区情况，社会氛围先上去了，大家的捐赠热情也高涨了，这次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热度。”

截至8月2日20时，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抗震救灾的社会组织有215家，其中省内社会组织有130家，省外社会组织有85家，参加志愿服务的人数为3784人。

除了捐赠热情不尽相同之外，四川发生灾害时很多志愿者和草根NGO自愿前往，媒体和一些专业救援队伍不得不发出叫停信号，希望大家不要盲目进入灾区。而此次，姚遥的感受是，甘肃本地NGO表现突出。“但目前灾区除了本土机构，和像中国扶贫基金会、乐施会、壹基金等几家机构活跃外，难觅其它NGO的影子。”

社会组织如何平衡？

可喜的是，甘肃灾区的第一所活动

板房希望小学已经竣工，涂猛本周就要赶赴甘肃，一是看看小学，二是考察灾情。

这所希望小学的捐赠方原本是要捐给西安的，临时更改了意向。

“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一笔甘肃定向捐赠，是百威的40万，他们打来电话说是要捐给西安，听我介绍完现在的供求关系之后，我问他们能不能把这笔钱捐给甘肃，他们同意了。”涂猛说，“现在西安那边已经到了供大于求的阶段了。”

主动协调内部捐赠资源，是社会组织可以寻求的突破。

从地震发生一直到7月28日，壹基金救援联盟这一次共有4支救援队投入到岷县漳县地震的救援行动，他们分别是：北京绿野救援队、青海户外救援队、四川南充山地救援队、新疆山友救援队，另外壹基金联合救灾的甘肃伙伴——甘肃公益救灾联盟共有11家成员机构，61位志愿者在岷县工作，先后利用小货车、三马子、骡车运送了50多车物资，主要是彩条布、帐篷、温暖包、饮用水等物资。

姚遥表示，壹基金在此次地震中的应急响应速度和人力与雅安地震相比，相差不多。而对于募款，姚遥说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壹基金可能会有进一步动作计划。虽然目前社会公众对定西地震的关注热度不高，但因灾区需求缺口巨大以及人道主义救援角度，壹基金将进一步提高对定西地震的救援级别，并初步预计将整体回应额度提升到两千万。

除了像壹基金救援联盟这样的专业救援队伍外，大部分社会组织的主要工

作是灾后重建。涂猛介绍：“由于这个阶段的链条比较长，就会给我们留出充分的时间来调度资源、动员社会资助等，捐赠人来了之后我们肯定是要首先动员，比如捐希望小学的话能不能捐给甘肃，所以后续的力度会大一些。”

“很多捐赠人和我们一起走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捐赠群体逐渐经验丰富、理性捐赠，我们也会组织捐赠人一起讨论、去现场看，他们如果认为刚开始指定捐赠的地方供大于求，就会更改。我们不能浪费捐赠资源，这个是基本原则，所以这个地方不行就换个地方。”涂猛说。

除了捐赠之外，人力的平衡也是一个考验。一部分人留在四川做重建，一部分人要有新的任务。目前，壹基金有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在前线，与壹基金的伙伴队伍们共同工作。而雅安的灾后重建工作也在平行进行，所以人力压力不小。

截止到7月28日，壹基金联合救灾已在梅川镇、中寨镇的24个村子、151个社发放了壹基金救援物资，共35,214人受益，受益人数接近10%受灾人口。

前方还需要什么？

甘肃社会组织联合救灾平台是由甘肃省民政厅委托甘肃省社会组织促进会在震后成立的信息搜集发布平台，从24日开始，他们每天发布一期简报，来发布灾区最新情况、社会组织工作动态、灾区接受捐赠情况等。

截至7月28日，这场地震造成了95人遇难，2114人受伤。定西是受灾最重的地区，多个村落被摧毁。地震还波及

到天水、陇南等多个地区。“地震经过一周后，救灾逐步从紧急救援转为过渡期。虽然震级和受灾的总范围上定西地震轻于雅安，但在人道救援方面，却比雅安困难得多。”姚遥如是说。

对比可发现，雅安2012年GDP为398.05亿元，而定西市为215亿元。根据壹基金救灾的过往经验，经济收入很大程度决定了农村住房的质量问题，而地震灾区房屋垮塌数量和当地经济水平成反比。虽然定西地震烈度较低，但是基于当地较不发达的经济水平，本次地震给定西地区带来的损失，尤其是给定西低收入居民带来的影响，将不亚于芦山地震。

姚遥介绍，雅安地震的震中在城镇，定西的主要灾区则分布在农村。农村的交通状况极为不堪，村落与村落之间又较为分散，救灾物资很难进入灾区。“震后当地又降暴雨，尤其是7月28日凌晨的暴雨，岷江水位暴涨，落石很多，让泥路更加破旧不堪，只能用牲口车运送物资。”

除了交通以外，天气状况也是灾民要面对的难题。进入8月，甘肃天气很快就要转凉，灾民的取暖就很成问题，因此对于灾后重建的速度要求很高。

“这个气候条件可能和四川还不太一样，有一个过渡期住在帐篷里也没关系，但是我们这边天气马上快转冷了，老百姓住的问题是急需考虑的。8月底还会面临一个孩子们开学的问题。”甘肃社会组织联合救灾平台负责人权平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还有，我们真的很需要大量专业的社工，能提供专业的服务，现在甘肃

注册的社工机构很少，专业性方面也不足，专业的心理辅导社工都很少。”除此之外，此次地震的灾区绝大部分是国家贫困县，“真的相当贫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恢复生产生活会很困难，而且甘肃这边现在吸引到的外界资金的确没有那么多。”

气候逐渐变冷，新学期在即，专业社工稀缺，贫困加剧，看来摆在社会组织面前的，不只是灾后重建的重任，还要和时间赛跑了。<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8-08/111844709.html>, 2013-8-8)◆

（上接22页）通过审批的项目执行。

对于未来的政府购买，李涛建议，除公开透明、公示评审过程、成败原因外，还应增加一个给各组织申诉机会的环节，“有的项目评审出现问题，这个机构就可以利用公示后的这个申诉机会，为自己再争取公平的结果。”李涛说。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3-08/05/content_15535.htm, 2013-8-5)◆

我国民间组织与建设美丽中国

作者_李伟 来源_人民网

民间组织是一种志愿性的、非政府性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在我国，活跃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内的民间组织一般称为环保民间组织，它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使命，不具有行政权力并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性服务的社会自治组织。在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环保民间组织的角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演变为生态环境保护不可或缺的参与主体之一，在倡导和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党的十八大报告确定了以两个百年目标为标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规划，首次强调建设美丽中国。中国民间组织，特别是环保民间组织，凭借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责发挥着积极作用，将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中国民间组织基本现状

中国的环保民间组织肇始于改革开放的变革浪潮。在自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间，我国的政府职能不断调整、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公民社会逐步兴起。正是这稳健发展的社会环境，孕育出了我国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烙印的环保民间组织。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民主政治推进为民间组织提供了巨

大的发展空间。近年间，我国的民间组织迅速发展，在历史舞台上要有愈发重要的地位。它们肩负着创新发展、参与公共服务、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同时也接受社会伦理与公民价值观的洗礼。

民间组织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搭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尤其在沟通、咨询、社会服务、社会调剂等方面发挥越来越有效的功能，通过社会互济互助活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

二、民间组织与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的核心之一，是生态之美。中国的环保社会组织在建设生态之美方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凭借独特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必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积极的力量。

建设“美丽中国”要求，必须妥善处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一方面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另一方面更需要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评估体系，对资源与环境进行价值重估，明确不同经济活动的环境与资源代价，进而寻找与本地区资源与环境禀赋相适宜的新路径与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



由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绿色公民行动”

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建设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在倡导和推动建设美丽中国的作用主要为以下几方面：

(1) 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是环保民间组织的先天职能。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为例，从成立开始就做了大量的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物种多样性，植树造林、防止污染、唤起公众参与等多方面的活动。

近年来，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通过广泛动员企业和社会力量，先后栽植生态林超过20万株，在青藏高原生态脆弱地区试种牧草5000亩。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民间组织“绿色生命”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通

过开展“保护母亲河”、“绿色公民行动计划”、“百万植树防沙”等项目的实施，在内蒙古沙化区域、黄河沿岸及城镇绿化空白等地植树造林、美化环境，防沙治沙，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和生态进一步恶化。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在重要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建设多种鸟类栖息地保护设施，为候鸟迁徙的驿站地提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为保护大熊猫、华南虎、野生红豆杉等珍稀物种，通过建设宿房、提供认养饲料、搭建护栏设施等，改善濒危物种的生存、生长环境，使其得到保护。民间环保NGO组织“绿色江河”，连续多年在青藏高原开展了冰川雪线退化调查和长江源头生态保护站建设，通过警示教育和动员社会公众参与，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长江冰川，保护长江源头生态环境，缓解母亲河源头的生态压力做出了积极努力；同时我们还通过对在阻止野生生物制品贸易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人员进行资助和奖励，鼓励专业机构阻断国际野生生物制

品贸易通道，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对野生生物的杀戮。

(2) 影响环境决策

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在协助、参与政府对重大环保法规、政策制定前期的调研论证，促进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参与公共决策等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环保民间组织发源于公众，汇集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参与，能够协助和参与政府对重大环保政策方针制定前开展调研论证，使政策更能反映公众对环境的要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的过程中，环保社会组织对其中涉及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及公益诉讼主体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促进了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环保社会组织，通过对各类公开发表的环境信息、数据的整理分析，定期发布污染企业违规排放信息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和城市环境信息公开结果的评价，督促企业改变环境违规行为，促进政府推进环境信息公开的进程等。另外，在我国重大项目的建设立项过程中，环保社会组织通过对项目环评工作的关注和参与听证等，促使有关部门对工程立项的环境影响做出了更科学的评价和审批。

(3) 推动社会建设

我国大部分的环保民间组织都组织或参与了面向社会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公益项目和活动，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农村，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垃圾分类、环保扶贫、饮水安全等方面开展培训、资助和工程示范等项

目。这些活动对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呵护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城市，许多环保社团按照保护环境的要求，组织“节能减排”、“垃圾分类”进社区、进学校的活动，把专业知识、操作方法、工具设施带进了这些地方，并通过培训形成机制。有效地引导公众、学生的环保行为。

在农村，北京地球村环境中心以灾区重建为契机，在四川彭州等市县实施“乐和家园”项目，围绕乡村的生态建设，在打造乡村生态民居、发展乡村生态经济、完善村民参与机制、实施乡村环境管理等，探索中国生态文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形成了样板，并开展推广工作。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从2010年起，连续三年深入边远贫困和生态脆弱的无电地区，帮助当地发展替代能源，改善少数民族牧民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生活质量，拉近了偏远地区和现代文明的距离。在西藏、青海、新疆等地，先后帮助23个无电村和42所小学建设了集中式、户用式光伏发电系统和便携式太阳能照明产品、太阳灶等，用清洁能源，帮助偏远地区2万多名牧民摆脱了落后的生活方式，用新能源照亮了他们的“中国梦”。此外，我们还为解决边远贫困地区农民饮水安全提供帮助，通过示范项目，为新疆、内蒙古的少数民族村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4) 大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

环保民间组织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开展环保宣传

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环境宣传教育是环保民间组织长期开展的工作，90%以上的组织都开展过环境保护宣传。其宣传对象覆盖广泛，包括不同年龄段和身份的人群。同时，其宣传内容也不断拓展。这些宣传活动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在传播环保知识和理念、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公众的环保行为。第二，通过各种环保公益活动的开展，培养公众参与环保的自觉意识和志愿服务精神。

在对青少年等社会群体进行环境教育方面，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携手企业力量共同开展的大型品牌活动“环保嘉年华”，通过趣味十足、寓教于乐的环保游戏，吸引广大少年儿童和家长参加，在快乐的氛围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其接受生态环境方面的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该活动自2009年开展以来，已经在55个城市举办了71场活动，共有150万人亲临现场、参与其中。“环保嘉年华”活动对孩子们的环保行为和家长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通过各种活动，培养公众参与环保的自觉意识和志愿服务精神方面，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针对大学生环保社团小额资助项目，目前已经资助了300多所高校学生社团的400余个环保公益项目，鼓励大学生到社区、到工厂、到农村、在校园开展多种多样的环保活动。依托于这些学生社团，延伸开展了针对小学生环保进课堂的“绿色小超人”项目，资助培训大学生社团骨干，到小学对小学生进行环保知识的系统教育，全国17个城市的170所

小学近10万名学生参加了互动式课堂环保培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总之，不同于政府制定政策与实行政行为的全球性，也不同于企业遵循社会行为的利益性，环保民间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性质，决定了其实施环保行为，促进文明提升的方式的灵活性、自主性和多样性。作为中国民间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力量，环保民间组织在这一事业中发挥作用的途径十分丰富。我国的环保民间组织在开展生态环境知识宣传、参与生态环境监督、维护公民环境权益等方面仍然面临着更大的发挥空间。

前面所列举的案例，仅仅是社会组织参与建设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在中国每一个环保社团和社会组织，都根据自身的宗旨和专业领域，围绕建设美丽中国的各个方面，积极开展多样性的活动。

“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在实现中国梦，建设美丽中国的道路上，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必将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贡献更大的力量。（李伟，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网址链接_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fortune/20130607/8117973.shtml](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3fortune/20130607/8117973.shtml), 2013-7-30）

王名说

社会改革不是纯粹的政党行动，但是它会有效地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是一个从社会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

公民社会离社会主义其实很近

作者_周执 来源_中国财富

“想在云南下一场雨，让社会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7月18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话音刚落，昆明果真就迎来了一场暴雨。在这场由民政部和云南省牵头的，名为“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作为专家，应邀出席。他眉头紧锁、目光如炬。

一个月前，5月28日深夜，记者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一次见到王名。在他下榻的酒店门口，几个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正把他团团围住。旅途劳顿加上接连几场演讲，昏黄的灯光映出了他眼底的疲惫，他却丝毫没有打发人走的意思。一旁的助理实在看不下去，只好出言相劝。这个眼神犀利、说话铿锵有力的中年男人，骨子里是一名耐性十足的好好先生。这两年他一直坚持在微博上带着自己学生读《大学》《中庸》，每天清晨准时发布，从不间断，好似修行一般。

2003年，年近40岁的王名成为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十年来，从一穷二白到提案专业户，其中酸甜，冷暖自知。尽

管大多数声音都石沉大海，不过今年两会，由他抛出的“全面放开生育的政策”的提案，在贴出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里，点击率就达到了3万多。他又一次切中了社会的痛点。

王名的敏感大概与多年坚持有关。1998年10月，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他在清华大学成立了NGO研究所，成为国内最早接触NGO的学者。15年的努力，他将一个边缘学科拉进了主流研究范畴，其间也身体力行地在多家慈善机构任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行动者。

王名说：“我工作的全部意义在于发挥学者的作用，真正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在他身上，你能感觉到强烈的“士大夫情结”。“俊义密勿，多士寔宁”（意为：正是仁人志士的勤勉努力，国家才得以富强安宁。）这是王名在微博上的签名，像是写给自己，也像是写给别人。

发展社会组织会推动事业单位改革
你怎么评价这次云南省高规格召

开“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对现行体制改革会有什么作用？

我们现在讲的改革现行体制，从根本上讲，是改革我们现在由民政部和相关其他政府部门共同建构的，登记机关和业务承管单位共同负责的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部门就是民政部。但是，民政部在推动改革和建构现代组织体制中有它的局限性。一方面，民政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民政部说到底还是改革自己。所以这次云南省是由省委省政府来主持召开这个座谈会，由党委和政府来积极推动社会组织改革，我觉得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整。

在新体制的建构初期，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地位作用，不是某一个部门，而应该是顶层设计、综合协调的问题，考虑到体制、职能、部门安排。把这些交给（云南省）民政部门去做的话，可能根本做不下去。由党委、政府来推动力度最大，可能会形成超越北京、广东的更具有全局性的综合协调体制。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阶段的核心目的是释放社会空间给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人民的组织，让人民通过社会组织真正组织起来，要从政府主导逐渐过渡到社会主导，要建立一种能让公众更多参与其中、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改革推进体制。

等建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就是我们要这么多社会组织来干什么。社会组织的根本职能不是公共服务，而是社会服务。我们国家的社会服务是事业单位提供的。事业单位是我国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建立的一种非常庞大的社会服务体制。事业单位掌控着社会服务的主要领域，是以一种垄断性的、和部门密切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的。这个体制如果不改，社会组织的发展就没有空间。

现在事业单位的改革主要是编制部门在推动，但其推动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事业单位改革改了十多年，一直没有全面推动起来。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没有动力。改革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在割政府的肉。那怎么找事业单位改革的动力呢？我觉得还是要从社会组织出发。社会组织的发展会成为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的积极力量，包括社会公众。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能让更多社会公众、

社会组织参与推动的事业单位改革体制。这就要求我们在总体设计、制度安排上更加向社会开放。如果事业单位改革成功了，社会体制改革的格局将全面打开。

社会治理改革是否需要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对接？

现行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人民团体。人民团体的改革也是社会体制改革非常核心的一个阶段。其改革难点在于所有人民团体都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功能，它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它掌控着巨大的社会治理资源和空间。我们人民团体的总量现在有700万家，而现代社会组织刚突破50万家，并且人民团体与现在体制结合得非常密切，它是总工联体制，在管理、资源配置、干部管理上跟党政部门一样。

这个体制的改革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一定要跟政治体制改革密切联系。因此，总体设计、顶层设计至关重要。现在的顶层设计一定要联系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未来层面，跟政治体制改革对接上。能否让社会组织成为政协的主要力量？因为社会组织才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如果政协对这方面改革推进，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就能得到提高。

部分官员对公民社会依然存在较大误解

现在政府的确培育了不少社会组织，但有一些做法仍是“运动式”的。这些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垄断了社会资源，也没有建设公民社会的理念。实际

上现在很多人也开始怕谈公民社会，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趋势？

社会组织概念是在2006年后才开始有的，并频繁出现在政府的文件、工作报告中。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社会系统的发育需要力量，我把它叫“还组织于社会”。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我理解为，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建设公民社会。政府现在主动面对公民社会，但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官员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仍存在很大误解，过于敏感，贴标签。其实完全可以定义为一个共产党领导下，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

党的领导和公民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其实要讲公民社会的历史、内涵，它跟社会主义的关系更近。把公民社会定义为资本主义是错的。习总书记上台后说要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那么能不能恢复对马克思主义公民社会的信仰？如果马克思的理论包括公民社会理论，我们可以下个定义，讨论公民社会的内涵是什么，不要乱贴标签。

可以有美国的公民社会，也可以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公民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离社会主义很近，马克思讲的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公民所有制，公民所有制是跟公民社会非常接近的一个东西。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很多政府官员不了解这个概念，没有论证清楚，在理论上就已经认识错误。

中国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

你上次去广东，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说，呼喊“春天来了”的人来了。现在

真的迎来了社会改革的春天了吗？

我的乐观其实是一半在解读，一半在期待。我的分析是这样，从改革开放致富至今，就存在一种很强的自发的、由市场经济发展本身释放社会的一种能力，所以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力，一开始就存在，而且一直在进步，包括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服务的提供、社会治理，都在积累这样一种动力。现在我们看到，从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在今后改革方案中间，顶层设计在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改革。

改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吗？

改革本身很难说是自下而上。自下而上是改革的动力之一，但改革的整个设计、战略和推进一定是自上而下的。村民自治已经做了探索，看上去是自下而上的，但最终也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

你如何看待未来的政治改革？

随着社会改革逐步地展开、深化，政治改革的问题会很快地提上议程，因为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不一样，经济改革会相对地绕开、避开，比较远离政治体制的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其实离得很近，很多社会组织是有一定的政治导向的。我们现在有意识地在政府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时候，说社会组织没有政治性、是非政治性的，但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会有它的政治诉求，完全没有政治诉求的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的主体是公民，代表一种公民权利的表达。我们讲还组织于社

会、还服务于社会、还治理于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有些议题实际上可以随着改革的展开和深化，把改革的议题提出来，而且已经开始在做。

人大改革的一个核心的方面是推动依宪治国，依宪治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讲的宪政，现在有人怕这个宪政，其实宪政我觉得跟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差别，市场经济一开始也是资本主义，有人说宪政是资本主义，宪政其实就是宪法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宪法的一种实现形式。根据宪法来实现行政、社会、政治系统的治理。不就这样的事情么？依宪治国是随着社会改革的推进必然要提出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政党自身建设，共产党自身的问题。随着社会改革的展开和深入，我觉得这个共产党的自身改革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其实已经在实现。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提法是，三个代表，其实你认真分析一下，三个代表是已经改变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把原来的公民的党变成了先进的党，你再往前走一步应该是，全民的党。共产党应该是全民的党，这是一个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非常重要的点。

社会改革不是纯粹的政党行动，但是它会有效地为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是一个从社会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

最担忧没等社会建设好就已经溃败

就你的判断，中国未来的改革图景是怎样的？

十三大提出了很多改革目标，如

党政分开、党内民主都还没有实行。但我从新领导人那里读到了一种社会改革的倾向。政治改革现在谈还为时过早。很多问题都不是政改能解决的，比如上访、利益集团、土地、住房、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拆迁等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社会改革得到有效的化解。在整个社会系统发育成熟以后再启动政治改革，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途径。

乌坎的政治改革是成功的，成功地实行了直选，但乌坎的社会气氛还没有发育起来，所以最后还是村委会面对每一个村民。本来应该是村委会面对社会，社会面对村民，有一个中间地带。一旦有了中间地带，很多问题就不能简单地反对还是拥护，而是有一个对话、协商、化解的机制。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都是单个的原子化。每个人诉求不一样，谁站到村委会的位子上，谁就成为对立面。

中国的改革也是这样，社会建设要先行，但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政改之前，社会建设会达到一定的程度，这对未来的政改是一个很积极的过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让社会稳定，这个稳定的系统对于下一步的经改、政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系统，经济改革也会遭受很大的危机。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社会溃败。一方面社会没有成长起来，一方面社会问题越来越激烈，这个过程中社会溃败是存在的。就怕没等社会建设好就已经溃败，这才是我最大的担忧。但还是有希望的，现在我们可以

看到上和下两种力量，这是一个积极的过程。怕的是上没有动静，下面在使劲推动，下面面临的阻力又很大。[（网址链接_http://zgcf.oeeee.com/html/201308/03/90583.html](http://zgcf.oeeee.com/html/201308/03/90583.html)，2013-8-3）

（上接38页）

冯仑：从大的方面来说，就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又爱又纠结。孩子想做的事，父母不让做，但又不能跟父母彻底闹掰了，互相体谅，但同时也得受点委屈。但从小的方面来说，我觉得，企业家跟政府的沟通，目前还比较顺畅。因为各地的发展基金，尤其像阿拉善，有很多的参与企业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和规模，地方政府肯定比较重视，所以沟通并不是问题。

相比纯粹的草根公益组织，企业家跟政府的互动要较好。但仍然会有前面的问题存在，彼此有矛盾，但又不能够破坏这样一个格局。这正如同家庭的格局，无论如何都要心存爱念、互相表达依恋，这种感情极其复杂，但这的确是一个现实。[（网址链接_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rwzs/201307/7268203438854606b7de38a71a21cad5.shtml](http://www.gongyishibao.com/gongyi1/rwzs/201307/7268203438854606b7de38a71a21cad5.shtml)，2013-7-2）

冯仑说

我们一直强调公益首先是改变自己。我认为，当你开始做公益这天起，你就已经变了，公益一定是先改变了你自己，才有动力去改变别人。

做公益不是威逼利诱

作者_艾己晴 来源_公益时报

被喻为“房地产商中的思想家”的冯仑，总是善于发现并提出“提纲挈领”和“未来感”十足的方案。一方面，他承认有些东西需要以时间的“无涯”来等待；一方面，他又不断勇敢实践新意，以无愧于其有限的人生。作为领导万通发展的“领袖级”人物，冯仑在处理各类争端上的本领，堪称一流，各种资源经他的合纵连横，常常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今，已经参与和发起诸如壹基金、阿拉善、爱佑华夏等8个公益组织的冯仑，又将视点聚焦在了一直以来困扰整个公益事业发展的“特困点”上来，即身处幅员辽阔的中国，公益组织如何在情况多样的地方，开展有效的公益行动。

曾有人告诉冯仑，有些环保公益组织和地方沟通非常困难，他们有时候给地方政府打电话，“连最低级别，连着打三个月，每天打两通电话都永远不曾有应答，门都不知道在哪开”，这样的困境引发了冯仑的深度思索。本次，

《公益时报》记者与冯仑对话，试图找到一些来自于他心中的解答。

冯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曾先后任职于中央党校、中宣部、国家体改委；“被下海”于20世纪80年代末；起家于疯狂的海南淘金时代；成名于中国近十年的房地产牛市。

相比于万通控股董事长的身份，现在冯仑更引人瞩目的身份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以及五个房地产行业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发起人。

《公益时报》：今年阿拉善颁奖中特别设立了一个给地方政府的公益奖项，这种非政府组织给政府颁奖的创意说明了什么？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我们怎么去跟地方政府和企业沟通呢？

冯仑：我们选择手拉手一起走。比如说我们在阿拉善的工作是治沙，但地方上有一些化工项目确实很不像话，我们边治理他们边破坏。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当中，会有一些不合格的企业被媒体曝光，我们所做的就是让地方政府把所有污染企业汇总起来，给我们拉出



一个很长的单子，把这些资讯全部透明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专门派来了一个团队，到北京跟我们开会，主要内容就是要透明，这件事不能再捂着；如果不透明，我们就予以上报。有很多不断违规超标的企业，环保部门前去处罚时会遭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但如果这些超标数据被实时地曝光出来的话，地方政府要再去干预执法，是会有压力的。

另外，事情的原因必须要找清楚，比如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原来招商引资过程中有配套的污水厂，但是污水厂建成后居然不开工，我们会继续追查这里面的情况。如果是财务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钱，但是他要把财产抵押给我们，等污水开始处理的时候，就会有收入，拿了收入之后就要还我们的钱。

公益组织先出钱帮忙没问题，但这笔钱是借的。因为一定要让地方政府明

白公益组织不是只来撒钱的，我们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公益生态，要追问效果。目前看来，以这种方案进行，我们的公益组织和地方政府会相互配合。因为我们本质是帮助地方政府解决问题来了，所以双方达成了很多共识。

你看，这样一来，既没威逼，也没利诱，我们手拉手一起做。这些事情，其实不是简单对立的一个情况，但也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能够和解，中间有一些小插曲，但是大方向是大家一起走的。

《公益时报》：那么，在这种与地方政府进行公益互动的过程当中，博弈的技巧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有什么方法可以向大家介绍吗？

冯仑：今明两年我们会把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到地方政府和监测的大企业上去，我们用这样的博弈来提升做公益的效能。对一个地方政府的进行矫正，比做一个具体项目省钱。另外，一些大的企业，特别是一些跨国的企业，如果我们能够引起全社会对他的监督，让他自己更警惕、更自觉，这样的话他会更加收敛。

公益诉讼也是博弈过程中非常不错的方法，用公益诉讼跟他博弈才花几十万元，但是他的整个效率会大大提高。他们改正之后省下来的资金给社会带来的好处何止百倍千倍。目前，我们也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完整经验，但我们相信，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互动是积极的，我们是在积极地探索和学习。

《公益时报》：我们知道，在地方做公益，项目的落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请结合你的实际经验来谈谈地方上的公益项目落地应怎样执行。

冯仑：拿万通公益基金会来说，我们是做生态社区的，而在生态社区中主要是水的问题。对此，我们基本上是从三个方面来做。第一是观念，即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在社区里做很多儿童的培训和教育，从小来改变他们的观念。

第二，我们开发技术产品。我们做公益并不是从开发商的角度去做，我们改造的40多个社区都不是万通的地产。这些硬件技术，有些是开发商当时就应该配好的，但如果我们公益基金会全做到位了，他们以后就不积极了。于是，我们做一点，也需要更多社区给开发商施加压力，让他们把该做的部分做好。所以，我们最后用“社区自治”的方式给开发商压力，让他们改进。

第三，行为矫正。我们和许多社区里的老人、孩子开展日常点滴行为的活动，比如拧紧水龙头，怎么收集雨水等等。

《公益时报》：你认为，公益成员在地方践行公益的时候，应该有怎样的素质？

冯仑：在不同地方做公益最重要的是端正公益理念，万通基金公益做的事，实际上是阿拉善活动的一个侧影。在治沙以外，阿拉善还要求成员企业自身要变成绿色企业。

我们一直强调公益首先是改变自己。我认为，当你开始做公益这天起，你就已经变了，公益一定是先改变了你自己，才有动力去改变别人。你改变别人越多，在这过程中就会越使你改变方向和力度，或者说对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说的公益，其实也

是一种私益，它会使你变成一个行为端正的人、眼光独到的人，并且，为人处事就不那么的势利。比如，在经营活动当中，就会更多地关注周围利益相关者，而克制唯利是图这样一个坏念头。当你能够克制、能在社会责任和盈利动机方面做一个很好的平衡的时候，你的企业就可以长久，而且可以得到更多利益。比如会得到客户、所在社区和股东等方面对你的支持，得道者多助，只要这些支持存在，你的企业就可以持久地发展下去。

我相信刚加入的一些新的会员企业，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要改变自己。除了监督别人，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每个成员都要禁得住监测，我们也要开展对自身成员的监测。

作为阿拉善生态协会，我们是一个环保组织，我们就不允许成员违背自己的承诺，去做不环保的事。所以我们会特别关注我们内部成员的行为，对他们不环保的行为，我们也会进行非常严苛的惩罚。我们有一个评估的方式，你做到了才能参加阿拉善，你要做不到，我们也会把他请出去。

另外，由于我们的成员都是房地产企业，我们会自己制订公约，比如控制工地上的扬尘。在自律之外，我们也会借助专业机构帮我们的成员企业做矫正。

《公益时报》：无论作为民营企业，还是作为参与公益事业的草根组织，都会对政府的情感特别地复杂。那么，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应怎样看待民营企业家和政府关系呢？

（下转35页）

朱健刚说

建设公民社会第一步在于培养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这是漫长且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教育过程，但我依然乐观，因为在不断播种的同时，一些新芽已破土而出。

构建公民社会的关键

作者_辛益公 来源_NGO发展交流网

我不觉得有不满的青年就是愤青，愤青总有一种过度愤怒的情绪，是很难与之理性对话的，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也都具有暴力倾向。年轻人对社会不公有不满情绪，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期望个体在社会中能够被理解和尊重。

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广州公益圈内的行动派学者。近三年来，他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与之并列的关键词还有“ICS(中大公民与社会研究发展中心)”、“公益”、“公民社会”和“年轻人”。依托公民课程和ICS的社会影响力，朱健刚正逐渐成为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最积极的公民社会倡导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教授曾如是评价他：“行动中的阿刚和思考中的朱健刚博士，同出一辙，内心都充满关怀。”

在朱健刚看来，建设公民社会，第一步仍在于培养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这是个漫长且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教育过程，”他说，“但我对此依然

乐观，因为在不断播种的同时，一些新芽已破土而出。”

谈公民教育：年轻人的热情和不满需要引导

记者：你本科和硕士期间研究的是政治学，读博时则转去了人类学，现在又致力于公民社会的探索，是什么经历促使你改变研究方向？

朱健刚：这主要与我关注的问题有关。刚上大学，我学的是政治学与行政管理专业，同时也辅修了法律；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的侧重点在政治社会学，这要求我们深入社区去调查社会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在这过程中我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产生兴趣。读人类学的博士期间，我选择了“城市底层社区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当然，这种选择也与我在2000年左右于上海吴街街道中部某个棚户区(贫民村)的调查经历有关。调查期间，住在棚户区的人都找我抱怨，他们希望通过



由邓飞等媒体人在2011年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

拆迁来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可当政府真的颁布了拆迁通告，人们又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去家园更让他们担心。我跟一个老头住在一起，这个老头看起来住得很差，可走到哪儿都有熟人打招呼，日子过得清贫而快乐；要拆迁了，他担心自己会被抛到远离中心城区的地方，那里虽然还属于上海，却已完全是陌生的世界。拆迁之事，对年轻人而言可能没太大影响，但对很多依靠低保、居委会的老年人来说则是巨大的挑战。拆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让我真切意识到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我希望能做些事情去缓和、化解这些矛盾。

记者：公民课程的开设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朱健刚：开设课程有很多原因。据我了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国外高校很早就开设了这门课程，但当时(2005年)国内的高校仍缺少关于介绍公民社会、公益慈善的课程；另一方面，我自己的研究重点也在这个领域，希望能跟年轻人一起探索公民社会的可

能。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希望公益青年能成为社会中的一股潮流，他们有担当、有创意，能够开创不一样的局面。

记者：“公民社会”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在讲课时，你如何规避“宏大叙事”的概念陈述？

朱健刚：“公民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用来解释宏观社会变迁的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比如扶贫救济、性别多元化、环境保护等。作为老师，我会选择通过多种具体形式传达这个概念：课程开设初期，其时国内的NGO还没有勃兴，我就给学生介绍志愿者精神和志愿服务；后来NGO发展起来，我便介绍草根NGO的成长和官办NGO的转型；再后来，各种社会企业不断涌现，我便把社会创新作为主讲内容。我的课程是与时俱进的，通过介绍大家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的事例，可以让宏观观念逐渐呈现出一个具体的图景。在谈论“公民社会”时，有人喜欢研究具体机构，有人喜欢研究整体社会，这些都是可以的。



记者：就目前的教学内容来看，许多学校都倾向于探讨公益慈善的课题，而对选举权、言论自由、多元文化等却着力较轻。这是否会让人产生“公益社会=公民社会”的误解？

朱健刚：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公民社会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公益慈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许多公民社会倡导者把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公益慈善领域，而自2008年汶川地震后，该领域已经被拓展出一片较为宽阔的空间，人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在我看来，“公益”与“公民社会”是交叉重叠的两个概念，当前，公益事业的发展最为突出，所以我们把它作为研究公民社会的重点对象。

记者：你的课堂常常会邀请各界嘉宾来分享他们的经历，在选择嘉宾时，你有哪些标准？这种案例教学方式能给

学生带来什么？

朱健刚：我通常都会邀请在公益慈善领域中比较杰出的人士。此前，我请来了一些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嘉宾，课程主要以他们演讲为主，我作补充，不过有同学反映这种形式会造成课程内容的连贯。因此这学期主要是以我讲课为主，同时请来一批广州本土的公益人士（广州近三年的公益事业做得比较好）分享经历，希望让学生能有“公民社会就在身边”的感受。一门课程，老师输出的更多只是一些二手思想，学生若只接受一个人的观点，视野就会狭窄。实务工作者的讲述能够让学生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可以让他们在交流和碰撞中学会以多元的视角看待问题。

记者：在博文《愤青、党青和公益青年》中，你提到，“看学生写的公民课程的期末报告，说到他去上公民课，同学竟认为那是愤青上的课……”你怎样评价这些选修你课程的学生？

朱健刚：我不觉得有不满的青年就是愤青，愤青总有一种过度愤怒的情绪，是很难与之理性对话的，他们的语言和行动也都具有暴力倾向。年轻人对社会不公有不满情绪，这很正常，因为他们期望个体在社会中能够被理解和尊重；他们对改变现状也充满热情，然而却不知道从何着手。作为老师，我首先是让学生对现存问题有个全面的了解，告诫他们不要带着情绪看问题；然后是介绍可行的实践方法，给学生的行动提供参考；学生实践后，我会和他们一起进行反思，检讨各自的得失。虽然说问题最后未必会有所改变，但至少大家在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在这过程中逐步

学会理性、平和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情绪需要引导，而不是引爆。

记者：受公民课的启发，一些学生走出课堂，先后参与了乌坎选举、增城新塘事件的调查，或是发起行为艺术活动。作为老师，你是如何看待他们这些行为的？有声音质疑，你在鼓励学生进行一些有风险的实践，对此你怎么看？

朱健刚：我觉得他们都挺了不起的，通过这些实践他们自身确实获得了成长。但我也有必要说明，学生课后的行为与我的课程没有必然联系，课程只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我从不规定或逼迫学生去参与某项活动。至于说学生的实践存在一定风险，我倒不这样认为。无论是前往乌坎村调查还是做行为艺术，他们都只是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做恰当的表达和参与。有人担心学生会遭到险阻，只能说明大家还活在不安全感很强的状态中。在我看来，通过我的课程，大家反而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至于做出过激行为。公民课强调不要用暴力来解决社会的不公正，而是要给社会提供正能量。

记者：我们当下的教育很少提到公民社会，即使提到也算不上是系统的讲述。你怎么看待这种现状？几年前杨东平教授也在大力提倡公民教育，并编写相关教材，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你觉得目前我国要普及公民教育还存在哪些障碍？

朱健刚：不能说中国没有公民教育，只能说目前的教育在教学方式和内容上不能满足年轻人的需求。爱国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但教育者若只会一味灌输，会造成学生

的反感。公民教育有很丰富的内容，它涉及的是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重点。面对新时代的年轻人，老师们不能再用过去那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去教学，而应该尝试采用通识教育的方法，鼓励更多的讨论、分享和实践。阻碍公民教育普及的原因有很多，教育政策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开放程度、市民的接受能力……杨教授的受挫是个别案例，不能就此推断公民教育的开展困难重重。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做公民教育，在我看来，走民间的方式可能会更好。

记者：公民课开展已有8年了，回首来看，你觉得它带来了哪些改变？

朱健刚：教育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公民意识的培养，它对人们的影响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成效去衡量。不能说有多少人上完课后，发起了一些活动，就证明课程是成功的。但听到某些同学把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用于社会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反响，我还是为他们感到高兴。公民社会不只是一种社会结构或者要实现某种功能，它应该是一种团结凝聚，也是一群义气相加的朋友彼此激励、共同成长的过程。我期待有更多理性、包容的公民出现，他们具有非暴力心态、权责意识和志愿精神。

谈公民社会：相信青年和跨界的力量

记者：在《社区的活力至关重要》一文中，你强调了“公民意识和公民美德需要成为社会建设的主流文化”，就你看来，公民意识的培养在广东（乃至全

国)正处于怎样一种状况?

朱健刚:据我观察,这方面正在发展,而且非常迅速,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履行公民的角色,比如说去年抗日游行期间,广州有高中生自发去清理路上垃圾,西安也有年轻人在路上举牌呼吁日系车掉头。他们的行动是极好的示范教育,提醒着人们“理性、平和、不盲从”才是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素质。所以说,不仅是学校在做公民意识的培养,每个人都能成为言传身教的“公民讲师”。

记者:近三年,广州本地的青少年公民不断涌现,媒体更是得出了“少年广州说”的结论;可另一边,他们的行动往往略欠成熟,有时候甚至会半途夭折。这种现实下,如何能吸引、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持续性地参与公民活动?

朱健刚:我认为,年轻人关注社会议题、投身公民活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大可不必刻意去设计、举办相关活动以吸引他们前来。当代青年有主见、有胆识、有创意,只需加以正确的引导,他们就能创造出许多让人惊叹的奇迹。无论是“举牌哥”还是“拇指妹”又或是“投诉合唱团”,他们都用新颖的手段拓宽了个人与政府的对话空间,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当然,类似“大学生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行动多以失败告终,这也许会给年轻人造成心理打击,但公民社会的构建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试错与纠错的过程,挫折和失败是公民成长的一部分。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不再一味地抱怨政府,而是自己行动起来,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

法,这种民众自身的主动性便成为公民社会发展最持久的动力。我对这帮年轻人充满信心。

记者:你曾多次提及,“跨界合作”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这种“跨界”要如何实现?

朱健刚: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是因为感觉跨界合作的时候到了。这种“跨界”既指政府、企业、媒体等社会组织与NGO的合作,也指公民活动中各种形式的融合创新。前一种跨界大致表现为政府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与NGO合作,企业从简单地捐款到直接与NGO共同完成公益行动,媒体积极参与公益传播等。由邓飞等媒体人在2011年发起的“免费午餐”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跨界合作例子。后一种跨界则表现为艺术与公民活动的有机结合,像投诉合唱团、“占领男厕”运动等,都是新鲜有趣的尝试。

只有各界都放下成见去沟通、协作和群策群力,这个社会才能走向包容开放。

记者:不少媒体都把广州评价为“最具公民社会气象的城市”,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朱健刚: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广州能获得这样的评价,首先是它有众多的志愿者和浓厚的义工文化。这些志愿者不仅是体制内群众动员型的志愿者,而是更庞大的、以社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志愿者,他们或在春节时给无家可归者送面包,或在地震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广州的义工文化不走高动员,而更强调民间自发。其次是这里的草根NGO。和北方许多以项目为导

向的NGO不同,广州的NGO是从志愿行动和社区服务中产生的。它们发展得慢,但是实在;体积不大,但是精干灵活且渐成网络。第三是广州开放的公众舆论氛围,这体现在一大批媒体对公民社会价值观的坚守和弘扬。当然,少不了的是广州本地的公民行动,从反垃圾焚化、预算公开、城市工程的反铺张到恩宁路的文化保育、撑粤语等,这些行动使得社会逐步开放多元,虽然行为偶有激进,也屡受打压,但还是能推动政府的政策变化。

更加难得是广州市政府,它对社会的宽松有着文化传统的积累。广州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它是真正的大都市,尽管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它却活力充沛,多元包容,动力十足。在这里,我可以学习怎样成为一名合格公民。

记者:有人说,尽管很多力量在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对于公民社会是否会真正到来仍表示怀疑。你是怎么想的?

朱健刚: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也很正常,毕竟国内的公民社会才刚刚起步,除了客观制约因素外,各类民间组织仍比较弱小,公民意识也只在局部地区兴起,还没有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公民社会的形成不是某项工程,不可能给它定下具体的时间表。在构建的过程中,个人、企业、政府、NGO等各方面力量会不断对抗、妥协、合作,最终形成一种开放、自由、民主的文化。这是要一步一步锻炼的过程,我的立场是保持平常心。公民社会不是一个遥远的要实现的世界,它就在当下,在日常生活中,在举手投足之间,在每日的行动中,它

很平常,但正因为此,它有韧性的力量。(网址链接<http://www.pubchn.com/articles/365337.htm>, 2013-7-17)

乔木说

改革开放不仅是观念和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也带来社会的多元发展。在内部的需求和外来的影响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重新起步了。

中国NGO的困境

作者_乔木 来源_南都网

7月18日，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很有影响，一直以智库和NGO自居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被民政部门取缔查抄。NGO的话题和相关的注册、管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NGO的全称是非政府组织，有时也称NPO，非盈利组织。从它的名称和活动来看，在中国存在三重困境。

一、有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前者如所有中字头的组织，像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尽管都以非政府组织定位、筹款、活动，但都有政府背景、行政级别，是有编制的事业单位。

二、一个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如果开展活动时不淡化机构的性质，非政府经常被理解成反政府、非法组织，尽管它们其实是在帮政府。

三、非政府组织如果宣称是非盈利组织，又会经常被误解不是为了盈利，那一定是有政治目的。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国，普遍信奉“无利不早起”，哪有不为盈利的机构？除非别有用心。

现实中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开展环保、劳工、维权救助、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行动，不光问题“敏感”，在筹款和活动中，往往又和个人、企业以及国外的同行、基金会等有合作联系，经常被另眼看待，甚至横加阻挠。

中国一直是官本位的社会，官家、政府的机构和活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商业行会、民间社团、各种宗教一直存在于乡土中国，只要不造反，官民两道，各自相安。

后来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新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强化了党政的双重领导，具有高度化的行政色彩。比如企业会有党委书记，学校有行政级别，寺院的方丈主持也会享受某个政治待遇。在此情况下，民间组织难以合法化存在，要么销声匿迹，要么收编重组，统一纳入政府序列。但民间的需求和松散的联系始终存在，只是难以合法化。

改革开放不仅是观念和经济上的巨

大变化，也带来社会的多元发展。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历史悠久，全球化时代又迅猛扩张。在内部的需求和外来的影响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重新起步了。

非政府组织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那是中国截至当时主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会议。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世界非政府组织论坛，中国政府有意安排到京郊的怀柔进行。绝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听说还有那么多没有政府背景的妇女、人权、宗教组织，甚至妓女都有自己的维权组织。

从那以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方兴未艾地发展起来。但是在中国的法律和管理中，回避了“非政府组织”这样的字眼，而是用民间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来指代，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由其监督管理。同时又规定，所有的社团登记，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和民政局实行双重管理。

这又出现了两重困境。第一，政府部门可以组建自己主管的社团，比如司法局可以成立律师协会。虽然号称非政府组织，但谁都知道它的政府背景。第二，真正的民间社团想注册成为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又难以找到政府主管部门，或者说，没有政府部门愿意管理这些不在编制内的社团。

好在以中国人的聪明，总有变通的办法。民间社团不能以“非企业单位”在民政局注册，但可作为企业在工商局注册。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号称NGO、智库、非盈利的民间机构，都走的这条路子。

但又面临着两个困境：实际是非盈

利的，经费也来自外界的资助，但由于是企业公司化的注册，要缴纳各种营业税、所得税、管理费。这不光给这些机构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做的事当局如果不满意，也会经常以偷税、漏税等借口被处罚注销。当年“公盟”被取缔就是一例。同时，这些机构实际上开展的研究、调查、社会服务等业务，也会被民政部门以擅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的理由，予以查处。传知行被取缔就是最新的例子。

今年以来，有了一点变化。民政部规定，对社会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等民间非盈利机构，可以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不需要挂靠政府部门，不需要注册资金，也不用纳税，这算是真正的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但是对于政治、法律、宗教类民间社团，仍需要挂靠政府部门。这类非政府组织很难成立，即使成立了，虽然号称非政府，但还是随时捏在政府“老大哥”的手里。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不予登记。虽然它们也在明的暗的活动，就看气候变化和“老大哥”的心情了。

本来小政府、大社会是发展趋势。但政府一看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社会发展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就想把什么事都管起来，但又管不住，只好一边承诺松绑，一边不断监控，选择性执法。

中国的政府和民间，就是这么拧巴。（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网址链接](http://ndnews.oooo.com/html/201307/29/88198.html) http://ndnews.oooo.com/html/201307/29/88198.html, 2013-7-29）

周俊英说

食品安全不仅仅是企业的经济行为问题，更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因而食品生产企业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大众生产安全的食品。

从恒天然事件看企业社会责任

作者_周俊英 来源_作者为本刊特约供稿

2013年8月，全球乳制品最大出口商恒天然集团受污染乳粉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随后，国家质检总局和恒天然集团协助中国四家进口商，对引进的可能受到肉毒杆菌污染的加工产品进行及时召回，所幸目前为止尚无人员受害情况报道。然而无可否认，这次恒天然乳粉事件又一次将中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推上了至高点。

食品安全，伴随着一系列网络热词，“皮革奶”、“瘦肉精”、“三鹿粉”和“地沟油”的出现，早已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2011年，仅次于房价和物价，食品安全在百姓最关注十大问题中排列第三。一连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挫败了大众本身就很脆弱的安全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一旦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社会问题便会接踵而来。从这一点上来讲，食品安全不仅仅是企业的经济行为问题，更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社会问题，因而食品生产企业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大众生产安全的食品。生产的食品一旦出现质量问

题，应及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将其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就这次恒天然事件而言，暂且不提恒天然集团是否对外界隐瞒了什么，从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此次恒天然集团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受污染38吨浓缩乳清蛋白事件，并采取了召回处理措施，体现了一个食品生产企业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市场活动中，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然而不顾及利益相关者的要求，一味的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企业经营目的最终将无法实现。积累财富的过程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应当是彼此一致的，只有兼顾企业利润与社会利益并重，才能在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发展开拓广阔的天地，最终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宏伟目标。根据目前国内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现在，对于国内的食品生产企业来说，最紧要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培养企业在市场活动中的道德责任感。肉毒杆菌事件中，恒天然集团积极主动应对食品安全事件，体现了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兼顾

经济利润和社会利益。在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感方面，此次事件中值得国内企业借鉴的要点如下所示：

第一，企业经营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体现在恒天然产品的自律性自我检测及有害产品的及时召回上。这次恒天然事件虽然在食品安全领域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恒天然集团，而将肉毒杆菌告知天下的也是恒天然集团。虽不能说如此恒天然集团就可以免于责难，但企业经营的基础——大众的信任感——却不会因此而荡然无存。人生难免有挫折，企业在市场经营中也难免会遭遇各种不测情况，一味的坚持企业利益第一，不顾及消费者的感受，不顾及社会的群体利益，最终难免在消费者的唾骂声中被市场淘汰。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对于企业经营也是如此，恒天然集团积极主动的去进行产品的自我检测，进行可能有毒产品的及时召回，用自己的行动及时挽救了消费者的利益。从2013年3月在澳大利亚的一家工厂使用的浓缩乳清蛋白中检验出梭菌属微生物到7月31日最终确定肉毒杆菌的根源，耗时半年的自我检测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对消费者健康的重视。在发现肉毒杆菌的同时，恒天然集团及时将信息公诸于众，进行相关产品的召回，这再次体现了作为一个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企业的社会责任来源于企业的高度自律性，在食品领域，这种自律性又是食品安全最大的保障。恒天然是世界知名的乳制品出口商，对于肉毒杆菌一旦曝光而引起企业形象受损，经济利润滑坡等后果是非常明白的，但是站在一个

长远发展的角度，恒天然还是选择了和消费者站在一起，在最后确定了肉毒杆菌的根源后，通过各种渠道通知相关客户和新西兰政府，将此次事件公诸于众。虽然这样恒天然产品中和肉毒杆菌联系在了一起，但是恒天然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是“无毒无害”的，甚至是“健康可信”的。据报道，事件发生后，当地华人反应说，“还是会一如既往地信任并选择新西兰奶粉”。企业的自律性是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根基，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又会给企业带来莫大的收获——即消费者的信任和选择，因此，企业自律性的提高是一次双赢保证，既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又给企业的长期发展铺垫了一条康庄大道。

第二，信息公布的透明性。确定肉毒杆菌后，恒天然集团对外公布的信息能够精确到批号，批次，库存地等，体现了企业信息公布的透明性。企业信息的透明有助于增加企业产品的社会监督力度，从而更好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挥。对于此次恒天然事件来说，则是有助于动员社会群体将肉毒杆菌对消费者权益的危害减少为零。实然，此次肉毒杆菌事件中尚未有出现疾病情况的报道。正如恒天然CEO西奥·史毕根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目前没有报道出现和这个产品相关的疾病现象，目前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的相关投诉。”

第三，解决问题的诚恳性。7月31日，当恒天然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西奥·史毕根斯得知恒天然乳粉事件后，决定从欧洲前往中国，和中国的相关机构、客户，以及广大消费者进行沟通协商。在8月5日于北京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西奥·史毕根斯也一再强调，“食品安全以及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地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恒天然集团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的解决问题的诚恳性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确定可能出现问题产品的批号，解决潜在安全问题。同时，由于和企业签署了保密协议，恒天然虽然没有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其中一家受影响的公司名字（据后续报道，此公司为雅培公司），但是也清楚明白的告诉大众和媒体，恒天然一直在和这家公司沟通接触，确保受影响产品的及时召回。在大陆的消费者面前，恒天然用诚恳的态度尽可能的挽回消费者的信赖，挽回其在中国市场的企业形象。这种面对问题勇于承担责任的积极主动的态度，本身就是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

2008年震惊中国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约30万名婴幼儿出现肾结石症状，多名患儿死亡。假使三鹿集团有恒天然这样的高度责任心，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件进一步扩大，那么后来的儿童受害惨剧也就不会发生了。三鹿奶粉事件事发距今已经5年了，然而在我国，食品安全仍然是老百姓提起来就头疼的问题。200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自律性差，食品安全的技术检验标准落后，导致企业无法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使得食品安全无法有效从源头上进行确保。因而中国食品安全的当务之急是

如何提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性，而非主要依赖外界监督来保障食品安全。借鉴此次恒天然事件，结合当前中国国情，需从两个方面提高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第一，提高企业的自律能力。企业的自律能力属于道德范畴，所以企业自律能力的缺失也体现了社会道德的滑坡，因而提高企业自律能力不仅能够从源头上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同时也会促进社会道德的回归，促使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高企业自律能力的首要前提是，促使企业以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中心。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单元，独立盈亏，所以，企业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然而，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纵然是企业的重要使命，不考虑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的企业经济行为必然只会因追寻短期经济利益而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

在中国，提高企业自律能力面临很大困境。一是国内检验技术相对落后，对产品进行反复检验又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不利于利益最大化；二是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薄弱，企业用廉价甚至不合格的原材料生产出的产品依然可以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助长了企业生产劣质商品的风气；三是政府维权部门能力有限，一旦发生纠纷事件，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对消费者进行相应保护，这也让很多消费者在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有种“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的感觉。

为此建议提高企业自律能力三步走。首先，由政府工商管理部门对企业定期举行自律意识提高培训班，传播有效的危机处理的方法，并对表现优秀的

企业颁发荣誉奖章，与此同时，发挥政府对民众舆论的导向作用，积极倡导企业自律行为，使企业自律观念深入每一家企业文化中。其次，加大对消费者维权保护力度。纠纷发生时，一旦确定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首先对消费者进行有效补偿处理，让消费者切身体会到“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如此既能有效保护消费者权利又能鼓舞消费者积极加强对企业的社会监督。再次，提高企业自身检测的技术水平和能力。政府应当给予优秀企业适当资助以促进企业提高自身检测的技术水平，从而在源头上遏制产品安全隐患。

第二，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郭美美炫富事件无疑给中国慈善领域投下了一颗原子弹，然而，由此而来的公益资金透明度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食品安全领域频出危机事故，严重的影响了老百姓的健康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产品信息公开的不透明性。这次恒天然事件发生以后，可口可乐公司，娃哈哈公司以及多美滋公司等均对外公布了受污染的产品及具体批号。然而在恒天然检测结果公布之前，中国的消费者没有办法了解相关产品的原料产地，产品批号以及检验结果。因此，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产品质量信息网，将产品的批号、产地、检验结果、原料产地、加工技术等级等信息公诸于众，让每个消费者对自己手中的产品都能做到有据可查，有诉可投，有理可辩。企业产品信息一旦实现透明化，就意味着企业时刻做好准备接受来自社会大众的监督，如此，企业将会在一个良性的环境中，即同时考虑经济利

益和社会效益的情况下，获得长期的发展。

据报道，此次恒天然事件发生后，新西兰市场中的奶粉并未受到影响，相反，民众认为恒天然及时召回有问题产品的举动是明智的。事件发生后，当地华人也曾表示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新西兰奶粉。由此可见，企业在市场经营中遇到风险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如何积极主动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用自觉行动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案，却是企业经营的重中之重。🔥

黄如论：中国卡耐基的朴素逻辑

黄如论数十年发展和慈善之路，能让人清晰地看到他身上的传统文化烙印。即便是他自己，也一直坚定地认为他的成长得益于父老乡亲的滋润、养育和关爱。因此他在富裕之后，乐于回报社会，特别是乐于回报养育他的故土和父老乡亲。

作者_陈雅琼 郭素 来源_证券日报

黄如论，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摩尔枭雄、亚洲第一商城操盘手、闽系房地产巨鳄、慈善的房地产巨鳄、中国慈善第一人，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机构编制管理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华商会会长，云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咨询团副主席，云南省人民政府顾问，北京银行董事局董事，中国致公党福建省委副主委，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慈善总会高级顾问，福建闽江学院副董事长，世界福州十邑同乡会名誉会长，《东南置业》杂志社名誉社长。

黄如论是自胡润慈善榜创榜以来连续十年入围前十名的慈善家，至今累计捐赠近35亿元。

“我这个人一不赌二不嫖，也不吸毒，我的钱连我儿子一辈子也花不完，干脆拿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好了。”黄如论这样阐述他从事慈善的初衷。

这位有“中国卡耐基”之称的企业家是世纪金源集团的董事长，在新鲜出

炉的《2013胡润慈善榜》中，黄如论以5.8亿元捐赠额再次荣膺中国最慷慨慈善家。把这张榜单往前翻10年，同样是黄如论以2.1亿元捐赠额成为第一个胡润慈善榜的首善。

十年慈善专注教育

黄如论并不是最富有的，在2012胡润百富榜中，他仅排在第46名，财富150亿元。但展开他的捐赠清单，却不乏大手笔。2012年，黄如论向清华大学捐了3个亿，其中2亿捐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1亿捐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成立中科院安老基金，另外反哺家乡捐赠1.5亿于连江慈善基金会，用于教育。

从1993年开始，黄如论不断刷新捐赠数额纪录，他始终专注的是教育和扶贫。福州会展中心、福建连江黄如论中学、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敬老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都获得过黄如论上千万元的捐赠。

对教育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自黄如论少年时期的经历，他曾说过：“我



出生于福建连江一个小渔村，小时候家境贫寒。为了养家，刚读到小学六年级就被迫辍学，丧失了继续念书的机会。1986年，我只身前往菲律宾。记得那时候没有知识的我在异国他乡寸步难行，因为不懂英语，进出海关面对全是英文的卡片我非常尴尬。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如果有一天我飞黄腾达，一定不能让我的孩子没有文化！”

捐款自由不设基金会

对于黄如论的义举，一名知名社会领袖有过这样的评论：“如果说有很多企业家的捐赠还是出于个人目的，那么黄如论可以说完全走出了这个怪圈。他以他的近乎神话般的伟大义举向社会昭示了一种真正的慈善精神。”

卡耐基代表着一些学者所谓的“自由慈善主义”，即捐赠不是为了有钱人精神上的救赎，而是为了改善受惠者的品性。“财富主要不是个人的产品，而是社会的综合果实。”卡耐基这样认为，没有19世纪末美国人口和经济的高

速增长，他名下的财富也就无从谈起。为此，还有人给黄如论冠以“中国卡耐基”的称呼。

而黄如论的儿子黄涛把父亲从事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归结为两点：“使心态得以平衡”，“有利于公司发展”。他认为，“在榜上越靠前，说明我们捐的越多。我们希望名次能靠前，这说明我们为社会做的贡献越大。再往深里想，这也说明我们企业经营的越好，这些方面都是能够彼此互证的。”

黄如论与卡耐基在很多方面其实不尽相同，他的捐赠表现得更随意，也似乎不像经过高度理性的复杂计算。

“以前我们没有做慈善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寺庙向老百姓发放一些现金。”黄涛说。即使是现在，黄如论的很多捐款也都是随机的、不经意的。“他听说哪个地方出现了危机需要帮助，就马上开支票，一两句话就把事情解决了。”

黄如论一直没有把捐款按照某种固定模式来运作，原因是“太忙了”，



2010年黄如论为内蒙古希望工程捐款3000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同志为黄如论颁发捐赠证书和纪念品

而他的儿子曾建议父亲建立一个专项基金会。但黄如论认为：“我自己的专长是创造财富，至于做基金会从事公益事业，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采取捐赠，而不是直接成立自己的基金会。”

做慈善是分内事

黄如论数十年发展和慈善之路，能让人清晰地看到他身上的传统文化烙印。即便是他自己，也一直坚定地认为他的成长得益于父老乡亲的滋润、养育和关爱。因此他在富裕之后，乐于回报社会，特别是乐于回报养育他的故土和父老乡亲。

论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完全出于一种感恩。他表示：“作为一个中华儿女，捐赠社会公益是我分内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张扬的。我是农民的儿子，经过这么些年奋斗，事业才有所成就，因此，我理当回报社会，特别是回报养育我的故土和父老乡亲。”

出生于农民家庭的黄如论，从小家境贫寒，但让黄如论感到骄傲的是，

家里有深爱着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周围也有不少关爱他的亲朋好友。被爱包裹的黄如论，从小就有一种感恩的心态：将来一定要用自己的奋斗改变贫困的生活，并以此答谢关心他的父辈和亲朋。这些梦想和信念，最终都化作了日后黄如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成为他从事慈善与公益捐赠的原始动力。

数年来，黄如论先后为公益事业投资人民币数十亿元，在北京、福建、江西、云南、重庆等地多处捐资兴建中小学教学楼、博物馆、医疗中心，并修桥铺路，设立各类助学金、奖学金、孤寡老人赡养基金、抚养孤儿基金。

其中，捐资1400万元资助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区政府抗击“非典”，在连江县城关按福建省一级达标校规划建设一所现代化公立全日制普通完全中学“黄如论中学”，捐资1.2亿元兴建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捐资1.8亿元建四年制本科大学“江夏学院”，向中国人民大学累计捐资1600多万，捐资1000万帮助兴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大楼……2010年更是向河南省正在筹建的一所艺术院校捐款3亿元。所有这些义举，受到了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及家乡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在黄如论的记忆中，自小家境贫寒的他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两天换一套衣服，让自己光鲜一点。因为母亲长年抱病，是祖母把黄如论抚养成人，祖母看见黄如论到处乱跑，心中既爱又恨，经常不厌其烦地教育黄如论好好做人，这些教导至今仍然回响在他的耳边。

黄如论说，儿时的经历对其性格有直接的影响，“对于我来说，金钱只是符号，赚再多也没有意义，现在，我需要做更多有益于社会和谐的事。”

慈生我心，善行天下

黄如论出身贫寒，早年投身于建筑业，经过一个个工程的磨练和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取得一定成绩。1986年赴菲律宾定居创业发展，事业成功后，怀着赤子之心的他1997年回到祖国。

目前，其所创办的世纪金源集团在中国大陆投资2000多亿元，开发各类商品房6000万平方米，向国家缴纳各类税费300多亿元，安置下岗工人8000多名，间接解决了8万多人的就业问题，以企业公民应尽的责任为中国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黄如论在致力企业发展同时，心系社会，乐善好施，积极帮助贫困人口改善教育、生活境况，走上脱贫之路。他捐出的善款大部分用于向经济困难的学子、老人，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民提供支持和帮助，设立各类助学金、奖学金、孤寡老人赡养基金、抚养孤儿基金、医疗救助基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等，为内蒙古、北京、福建、江西、云南、重庆、湖南、贵州、四川、山东、新疆、甘肃等地的贫困群体带去生活希望。

2010年，黄如论捐资3000万元，成立了“内蒙古希望工程·黄如论爱心基金”，三年内，捐建30所希望小学、资助4000名贫困家庭的大中小學生，为20

所中小学添置高科技教学设备，培训600名乡村教师。2009年，黄如论向山东省慈善事业捐赠6000万元，其中三分之二的资金用于救助贫困学生和孤寡、困难老人，三分之一用于敬老院和中小学校建设，主要用于临沂、菏泽两地。2008年，黄如论先生向云南出资捐赠1亿8160万元，围绕扶贫开发、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第三产业、社会事业等重点内容，进行更为科学、系统地捐赠，把单纯的“输血”改为促进“造血”，将传统意义上的“济贫”升级换代为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根本性地提升捐助的有效性和长效性。他还先后为重庆市教育事业捐资超过2000万元，让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实现继续上学的梦想。

有一年，黄如论回家乡福建期间，听说福建古田县有一个农民因为穷困看不起病，在身体和经济双重困境的压迫之下，产生了异化心理，拿着炸药在公交车引爆自杀，伤及他人。这让黄如论既震惊又同情，为了避免再上演这样的悲剧，他决定拿出一亿元来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医疗互助基金会，成为国内个人非公募基金会之一。时至今日，这笔资金已经捐出数百万，惠及了众多家境贫寒的患者，给予他们雪中送炭般的及时帮助。

二十年来，黄如论平均每小时捐出两万元。他的大爱精神，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赞誉。

我捐出的都是真金白银

“做人一定要低调。”这是黄如论经常说的话。按照这一原则，他绝少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各种论坛，只是因为

实力雄厚，黄如论在地产界的名声很大。

“一个人要实实在在做事情，不要做一点儿事就讲话讲得过分。有些人讲只给富人盖房子，讲七讲八，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中国有多少富人？赚了一点小钱，对社会根本没有一点关爱，还没有走一步，就跑到十步去了。”

黄如论有资格这么说。累计捐款近35亿元，在中国的地产商里绝无仅有。如此庞大的资金对一个地产商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当然，这些钱如果去投资，可能赚很多。但是不一样，一个是求事业的发展，一个是对社会的关爱，境界不同。一个人老想着我捐的钱要是去投资能赚多少，那就捐不了钱了。有的光承诺捐多少多少，你捐了几个学校？学校在哪里？光承诺，不算英雄，我拿出的都是真金白银，绝大多数是我的个人财产。”黄如论说。

黄如论自言以后不会留给后代很多家产，大部分会捐给社会。“在我老的时候，走到那些学校去看看，对我也是个鼓舞，是个不会磨灭的纪念。”


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

黄如论从小由祖母带大，祖母多年中反复告诫他“不要骗人、害人、欺人、诈人”、“慈悲为本”。早在十几年前，黄如论开始每个月定期给家乡村子里满60岁的老人发生活费。“那时候我的钱不多。这些老人温饱没有问题，只是缺少零花钱。”现在，接受照顾的老人的数目增加到了300个。

黄如论认为自己村子里一位给他讲过三国等故事的老者对他影响很大，因

此把老者的儿子培养成了公司里的一个总经理。早年在菲律宾寻求发展时，黄如论不通语言、举目无亲，但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发达之后，当初帮过他的人都得到了回报。“饮水思源，以德报德，别人支持我1，我支持他10。不报答，那成了什么人啊。”

在慈善路上，黄如论始终孜孜不倦、默默奉献，他崇尚“饮水思源，以德报德”的价值观念，竭尽一己之力，参与和谐社会之创建。黄如论认为人生的幸福三个方面：第一，拥有完美自我、获得事业成功；第二，与社会、与他人和谐共处；第三，拥有幸福的家庭。“人活一世，谁都渴望有成功的事业、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家庭，经过努力，也可以拥有这些。但时光的流逝，却是人类无法抗衡的，所以我认为，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道德的长度和良知的宽度，在于为他人和社会奉献了什么，有了这些有品质的思想，才能成就真正有品质的人生。”

黄如论领导世纪金源在发展中，将企业发展的愿景深深植根于个人、企业和社会共同进步的人文土壤中，以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积极解决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以内外兼善的胸怀和慷慨无私的捐赠践行企业公民的责任与社会价值，实现了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网址链接_](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30427/054515299121.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30427/054515299121.shtml>, 2013-4-27; <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2-11-21/111239112.html>, 2012-11-21)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简称壹基金，由李连杰发起的一个独立公募基金。壹基金提出“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概念，即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大家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

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简称壹基金，由李连杰发起的一个独立公募基金。曾经是中国红十字会架构下于上海独立运作的非公募公益组织，后来转至深圳注册，获得深圳地区独立公募基金的资格。

壹基金提出“1人+1元+每1个月=1个大家庭”的概念，即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集合每个人的力量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随时帮助大家家庭中需要帮助的人。壹基金通过举办“全球公益慈善论坛”和“中国红十字会壹基金公益奖”，搭建公益平台，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为促进中国公益事业和公益产业的专业化发展，壹基金就其关注的“环保、教育、扶贫、健康”四大公益领域，发起年度“中国红十字会壹基金公益奖”颁奖活动。壹基金通过建立“中国红十字会壹基金公益奖”，对需要资金支持的公益项目进行评估，并对符合标准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以此带动业内“诚信”价值观。同时，壹基金期望

通过公正、透明的评选，确立行业标准和规范，鼓励公益组织良性发展，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此外，壹基金与博鳌亚洲论坛合作创立“全球公益慈善论坛”，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公益组织、知名企业、政府官员、研究学者，促进全方位交流与合作。该论坛每年举办一次，旨在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平台，加强国际间公益项目合作，分享经验，完善公益组织体系，广泛集聚公益资源。

为了确保慈善公益基金的透明度及公信力，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对善款的使用进行审计。同时每一季度公布季报，每一年度公布年报，向公众详细介绍“壹基金”的善款募集和使用情况，诚邀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共同监督。

成立过程

2007年，李连杰先生创立启动了壹基金。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2010年12月3日在深圳注册成立，是中国第一家民



间公募基金会，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壹基金战略模式为“一个平台+三个领域”，即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三大公益领域。

2007年，李连杰先生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

2008年10月，为了保证公益项目更高效地实施，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市民政局等多方主管机构的指导和支持下，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的执行机构，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严格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展各项业务活动，向“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进行专项的汇报与结算，并接受年度审计。

2010年12月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正式

注册成立，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为5000万元。

“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及“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已清算注销，其项目、资金及工作人员已由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承接。

2011年1月11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举行揭牌仪式，宣布深圳壹基金正式成立，此举标志着壹基金成为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据悉，这是国家民政部门积极推进社会慈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大力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基金标志

李连杰先生壹基金倡导着“壹基金壹家人”的公益理念，壹基金标志设计中的“1”代表着每一个1。

文字与图案元素构成了其标志，图案围绕着数字“1”构成了一个笑脸。公益活动的力量对社会是积极的，推动了



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拉力赛

我们每个人内心的那些善良，就像是那句话“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将如此美好”。

公益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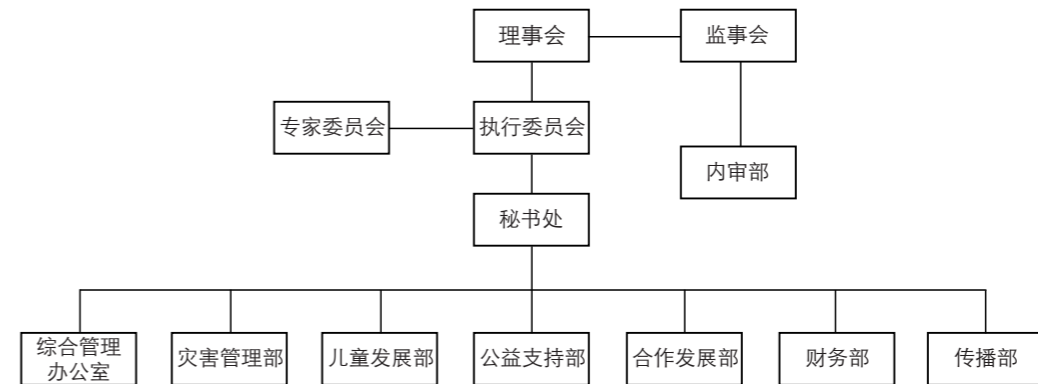
壹基金联合救灾：“壹基金联合救灾”联合民间公益机构、媒体、企业与个人，采取“提前备灾、联合行动、快速救援”的策略，为中小型自然灾害中受影响的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提高民间对中小型灾害的响应水平，儿童及其他弱势群体受益。推动成立民间联合救灾网络，成为民间救灾的主力军。促进民间救灾网络的运营水平，提升救灾的公信力。

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壹基金“海洋天堂计划”源自电影《海洋天堂》，本计划联合全国范围的民间服务机构形成网络工作模式，为脑瘫、自闭症、罕见病等贫困特殊类型残障儿童提供救助，提高民间机构专业服务能力和组织发展能力，联合企业、研究机构与民间

机构进行公众宣传与社会倡导，促进国家对特殊类型残障儿童的关注与政策支持，以帮助他们在确保其尊严、促进其自立、有利于其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

壹基金温暖包：壹基金针对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的严酷生活困境，发起社会各界捐赠“壹基金温暖包”的活动，以解决凝冻灾区和西部高寒山区儿童御寒物资特别缺乏，过冬衣物、条件和设备均不足的问题，为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送去温暖，送去社会关爱。自2011年，壹基金开展“西南凝冻灾害民间联合行动”和“大爱压岁·温暖孤儿行动”以来，共有4省36县乡8389名受凝冻灾害影响儿童和4省18县10436名孤儿收到“壹基金温暖包”。2012年，壹基金联合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再次发起为凝冻灾区儿童和孤儿送“壹基金温暖包”的行动——凝冻灾区儿童&牵手孤儿温暖行动。计划帮助10省21300名受凝冻灾害影响的儿童、孤儿、事实孤儿。温暖包行动通过联合中西部地区的民间公益组

组织架构



织，倡导社会关注和参与，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帮助凝冻灾害中的儿童、留守儿童、孤儿及事实孤儿，为他们筹集更多社会资源。

USD0自律联盟：USD0的中文名称是“自律吧”；英文是the Union of Self-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s;缩写为：USD0。“自律吧”是一个由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共同组成的社区，是国内首个由民间公益机构发起，推动行业自律，公信透明的社区。这个开创性的社区，由“承诺对自己、他人负责任”的社会组织们自发组成，通过制定、遵行规则，来加强交流，建立自律机制，促进信息公开，保障捐款人的权益，逐步推动建立适合社会组织生存的法律和社会环境。“自律吧”的宗旨是：促进USD0内社会组织的自律，提升USD0内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策略战略

壹基金的公益愿景为“尽我所能，

人人公益”。壹基金战略模式为“一个平台+三个领域”，即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

灾害救助：壹基金关注受灾群体的需求，及时对重大灾害做出反应，向灾区提供救援，减少灾害的冲击和影响。

儿童关怀：壹基金关注处于困境中儿童的需求，改善他们在教育、卫生和营养方面的条件，营造健康成长环境。

公益人才培养：壹基金支持公益行业研究和公益人才的培养，为公益行业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公益管理人才。

人员构成

壹基金是独立的法人机构，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及《章程》进行治理。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委员会行使常务决策权力，监事会紧紧围绕“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设的制衡机制，与理事会、执委会共同防范风险，促进稳健发展。

壹基金理事会由十一人组成，分别为冯仑、李连杰、柳传志、马化腾、马蔚华、马云、牛根生、王石、杨鹏、周其仁、周惟彦（排名按汉语拼音次序）；

监事由四人组成，分别为刘东华、马宏、宋立新、张敏；

周其仁担任壹基金理事长和法人代表；

王石担任执行理事长；

马宏担任监事长；

马蔚华担任预算委员会主席；

杨鹏担任秘书长；

作为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先生继续担任理事。

相关事件

芦山地震捐助

芦山地震后科技企业纷纷献爱心，总捐献金额已超过2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比特币也首次在中国成为捐赠物。壹基金合作发展部总监霍庆川昨日在微博透露，截止到2013年4月22日18:18，壹基金收到91个比特币。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比特币用于公益事业的优势和好处在于，所有捐款过程均为公开透明，任何人均可查询，没有人可以造假。

同时，李连杰也在微博为壹基金正名，李连杰保证：“壹基金一定会尊重捐款人的整体意愿，专款专用于灾难救助和灾后重建。我本人深信，没有人有胆量将这笔来自全国的善款私自挪为他用或乱用。至于善款的具体数额，壹基金将会以实际到账为准，尽快向社会公

布。”李连杰同时公布了壹基金11个理事的姓名，包括马云、牛根生、马化腾等在内，负责运作的则是王石。

雅安地震筹款

2013年4月20日，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截至4月20日20时，壹基金经确认的救灾捐款已经超过千万元，此外还有一些意向性的捐款尚未确认。

值此四川雅安地震之际，由李连杰等人主导的壹基金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筹集善款及帮助救灾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依旧有网友对壹基金慈善款项的用途做出质疑，有名为“一两月色半壶老酒”的网友发微博爆料称，根据壹基金英文官网Donation页面，壹基金收到的钱都是要打入红十字会账户的，但是中文官网只字未提，却一再强调和红十字会的剥离。“一两月色半壶老酒”强调壹基金不能蒙蔽大家，必须给大家知情权。

4月22日，四川芦山7.0级地震地震后，各路捐款一直倍受关心，透露目前收到的善款总额超过3100万；银行账户除以上外实收善款1025.94万元。

据壹基金公共微博消息，截止4月21日24:00，共有超过45万人次的爱心家人和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向壹基金联合救灾雅安专项救援捐赠：天猫网店、支付宝E公益平台、腾讯乐捐、新浪微公益善款总额超过3100万；银行账户除以上外实收善款1025.94万元；还有很多爱心壹家人的捐赠尚在途中。

现在仍是灾害发生后黄金72小时救援期，壹基金联合救灾雅安地震救援行动的伙伴们兵分多路，同时赶往受灾地

区紧急驰援。

21日凌晨4时，壹基金雅安救灾应急预案正式发布：第一阶段紧急搜救，主要挽救生命、抢救物资；第二阶段是自然灾害发生4-8周以内的灾后安置，保障灾民基本生活需求；第三阶段是自灾害发生起至1-2年内的灾后重建期，为灾后儿童提供心理康复设施和服务。壹基金也承诺善款将严格限于三个阶段的救灾使用。

与紧急搜救工作同步展开的是救援物质的发放。21日，地震发生当天由联合救灾的伙伴陕西汉中志愿者协会、贵阳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遵义市义工协会、西昌市生态与环境保护研究所分别从西安、贵阳、遵义、成都仓库起运的首批物质包括大帐篷、棉被、应急灯、睡袋、彩条布、卫生用品、生活用品、千斤顶、金立手机、水、食物和消炎药等已经运抵雅安，正在根据一线反馈的灾情陆续安排发放。

其中，70条彩条布和80床棉被下午已由伙伴西昌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在雅安市上里镇发放给当地村民。12顶救灾帐篷也在下午搭建在了上里镇七家小学，地震后学校成了危房，天气也时有阴雨，学生缺乏安全的庇护场所。帐篷运到学校后，在志愿者执导与村民协助下，搭建成七家村的临时安置场所，并为儿童提供安全场所。同时，救援行动还为上里镇共和村、七家村、庙坪村发放了彩条布170件，棉被240件，以及生活及卫生用品。

今天从成都采购的物资也已经运到了雅安，包括1116个睡袋，其中203个睡袋、彩条布2件已经运往合江镇，计划发

放给203户房屋倒塌户。另有千斤顶63箱，棉被79床，矿泉水4件，计划22日在中里镇发放。今天还备齐了150吨米和6000桶油，预计明晚发车送往受灾乡镇。

根据前线反馈的灾情，许多村庄仍缺水缺食。壹基金灾害管理部项目官员曾敏今天与当地志愿者一起将1000件(24瓶/件)矿泉水，分别运至龙门乡、双石镇、清仁镇、思延乡和芦山县各安置点并全部发放完毕。

同时，壹基金联合救灾行动今天在雅安筹备建立“联合救灾”芦山民间救援指挥部，转运各路救灾物资，协调网络伙伴参与救灾。💧

联系方式

注册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紫竹六道敦煌大厦7楼D

邮编：518048

总机号码：400 690 2700

传真号码：(+86)755-2533 2611

网站：www.onefoundation.cn

邮箱：info@one-foundation.com

传播邮箱：ofpr@one-foundation.com

各方言论

苏网公益：#公益沙龙#13日南京首届2013网络公益沙龙成功举办。在南京，义工联通网络招募义工为弱势群体服务；网络公益联盟组织网上公益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活动；爱心妈妈群通过QQ群，救助困难患病儿童…网络公益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博爱之家-南京爱心妈妈群：#好消息#热烈祝贺博爱之家南京爱心妈妈群被评为江苏省妇联“十佳”巾帼志愿服务队。荣誉属于群内每一位志愿者。感谢所有志愿者的关注、信任和长期以来的默默支持，未来的道路上，我们一起努力，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加油！

中国慈善家杂志：【南京市民与市环保局长电视栏目面对面交流】“请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敢不敢跳进玄武湖、秦淮河里游泳？”近日，在江苏省南京电视台“民声”栏目参与“如何铁腕治污”话题讨论时，4名市民代表向南京市环保局局长包洪新频频发问，不仅问题犀利，还现场数次打断包洪新发言，并轮番进行逼问。

爱之光公益发展中心：【江苏卫视报道社工】江苏卫视公共频道某栏目跟随@爱之光公益发展中心 理事会 到访上海金扬社区，参观了一个社工服务机构承办的老年服务中心并进行了相关采访。其实现在的社会公益组织和社会工作还不是那么为人所知，期待媒体多报道公益。<http://t.cn/zQL7Cei>

媒体：【你转发一次，被打女孩就可获得捐款一元！】因为劝阻乱扔垃圾，昆明女孩在大白天惨遭暴打。这一幕，我们看得很心痛。维护公德，真有那么难吗？你若转发声援，马云的公益资金即奖励女孩1元钱（上限2万元）。让我们一起行动，让女孩知道，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SEE创绿家：#创绿家计划第三季正式启动# 环保公益创业团队注意啦！1-20万元不等的环保公益创业资金等你拿！有行动，就有支持！本季资助计划初选拟于10月下旬开展，终选将于11月举行。2013年9月16日18:00之前提交申请的团队都将进入第三季筛选流程。把你的环保公益梦变成现实，快来申请吧！

仁德基金会：【益海嘉里金龙鱼高东工业园探访】近日，受金龙鱼慈善公益基金会的邀请，@仁德基金会培育项目 组织培育伙伴近20人赴益海嘉里集团高东工业园区进行探访。近距离观摩对益海嘉里水稻加工产业循环经济模式、豆奶工艺、优质产品原产地分布等做了详细了解。

满天星公益：#2013年心平·满天星公益阅读夏令营# 贵州片区的100位星星家人已经到达柳富小学和礞溪小学两所中心校啦！由于柳富网络环境有限，我们先来一睹礞溪小学的周边环境吧！随便一张都可以拿来当桌面的有木有，最后一张照片主页君也被惊呆了~~

安利公益基金会：#志愿者在行动# 7月2-4日，安利志愿者走进呼伦贝尔海拉尔区胜利小学，开展“7.2小时·1公斤盒子”志愿活动，为学校和孩子带去音乐器材等教学用具和学习用品。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和改变，同时倡导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共识网：胡鞍钢：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与西方的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基本原则所组成，这里的“公”相对“私”而言，“人民”相对“市民”而言，“市民”注重的是私利，“人民”注重公利和公益，但是并不排斥私利、私益。

一天公益oneday：#一天公益-灵关#一天公益-三方助养小组经过两周、4个村37个组112户人家的入户走访。共筛查出13个贫困、单亲、留守、孤儿、残疾、长期病患情况家庭的孩子，需要进行长期助养。

铜陵文明：我市近期在公共场所、主次干道推出了一批中国范儿公益广告，广告造型新颖，别具特色。一改以往较为单一、说教的方式，特别是孩子们看了后，都说画面可爱极了，以后都要按照画面内容做。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采取这种平易近人、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大家在耳闻目睹中受到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

新浪公益：#公益与声音#【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建公益慈善项目库给予最大税收优惠】云南在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方面，营造公益慈善的文化氛围，建立公益慈善项目库，给予最大力度的税收优惠，吸引公益慈善组织聚集到云南发展，坚持立法先行，形成全社会做好事做善事的良好氛围，让公益慈善之光更加灿烂。

主持人王丽红：非常感谢小雨姐姐长期以来对海内外学子在教育与社会公益上的鼎力支持！因为心中有爱，所以『爱星满天』哦，请想了解我们“中美青年教育交流论坛”更多细节，以及想知道我们美国名校大学生对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思想的朋友，请于明天下午4:00准时收听小雨姐姐的『爱星满天』节目吧

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FTI排行榜

2013年7月20日 top25

作者_未知 来源_基金会中心网

网址链接_ <http://www.ffi.org.cn/fgm.html>, 2013-7-20

序号	代码	基金会名称	分数	公募排名	全国排名	12周幅度(公募)	12周幅度(全国)
1	104012	爱佑慈善基金会(原名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2	117162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3	111442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4	110042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5	327282	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6	100562	南都公益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7	148212	山西省葵花助学基金会	129.40	1	1	262—1	503—1
8	319462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9	442712	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	129.40	1	1	16—1	35—1
10	121922	天津大学北洋教育发展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序号	代码	基金会名称	分数	公募排名	全国排名	12周幅度(公募)	12周幅度(全国)
11	106571	浙江绿色共享教育基金会	129.40	1	1	21—1	45—1
12	104181	浙江正泰公益基金会	129.40	1	1	1—1	1—1
13	100471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	127.54	13	33	13—10	33—26
14	100621	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	127.30	14	36	14—11	36—28
15	102201	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	127.00	13	37	15—12	37—29
16	109601	中远慈善基金会	126.94	16	38	21—16	47—37
17	100461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126.40	17	39	17—13	39—30
18	510441	南京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26.39	18	40	18—14	40—31
19	101441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126.35	19	42	19—15	42—33
20	512051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125.35	20	45	20—18	45—38
21	362661	华民慈善基金会	125.00	21	47	21—17	47—37
22	333621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124.82	22	48	22—30	49—41
23	100701	瀛公益基金会	123.20	23	51	64—23	132—51
24	102281	陈香梅公益基金会	123.06	24	52	24—22	52—43
25	102371	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	121.78	25	54	33—24	72—53

2012胡润中国百富榜top40

作者_胡润 来源_腾讯财经

网址链接_http://finance.qq.com/a/20120924/004293.htm, 2012-9-24

2012排名	姓名	2012财富(亿元)	公司	2011排名	2011财富(亿元)	总部	行业
1	宗庆后家族	800	娃哈哈	2	680	浙江杭州	饮料
2	王健林	650	万达	6	450	北京	房地产、文化产业
3	李彦宏	510	百度	3	560	北京	搜索引擎
4	严彬	500	华彬	4	500	北京	饮料、文体、地产、投资
5	梁稳根	460	三一	1	700	湖南长沙	重型机械
6	刘永行家族	450	东方希望	8	410	上海	氧化铝、重化工、饲料
7	马化腾	410	腾讯	13	340	广东深圳	即时通讯、门户网站、在线游戏、C2C
8	吴亚军家族	380	龙湖地产	7	420	北京	房地产
9	许家印	350	恒大地产	5	460	广东广州	房地产、投资
10	陈丽华	340	富华	16	330	北京	房地产、紫檀博物馆
11	杨惠妍家族	330	碧桂园	10	360	广东佛山	房地产
12	卢志强	300	泛海控股	19	300	北京	房地产、金融、投资
12	许荣茂家族	300	世茂	31	250	上海	房地产

2012排名	姓名	2012财富(亿元)	公司	2011排名	2011财富(亿元)	总部	行业
14	李金元	280	天狮	34	220	天津	保健品
14	刘永好家族	280	新希望	19	300	四川成都	农业、食品、化工、房地产、金融
14	沈文荣	280	沙钢	13	340	江苏苏州	钢铁
17	孙广信	270	广汇	19	300	新疆乌鲁木齐	房地产、汽车连锁、天然气、煤炭
18	鲁冠球家族	260	万向集团	19	300	浙江杭州	汽车制造业、房地产、农业、有色金属
19	丁磊	250	网易	34	220	广东广州	门户网站、在线游戏
19	张士平家族	250	魏桥创业	19	300	山东滨州	纺织、铝业
21	张近东	235	苏宁电器	11	350	江苏南京	家电零售、房地产
22	童锦泉	220	长峰房地产	33	230	上海	房地产
22	朱孟依家族	220	合生创展/珠江投资	28	260	广东广州	房地产
24	陈卓林家族	215	雅居乐	27	265	广东广州	房地产
25	何享健家族	210	美的集团	9	400	广东佛山	家电
25	黄光裕家族	210	鹏润投资	16	330	北京	家电零售、房地产、投资

2012排名	姓名	2012财富(亿元)	公司	2011排名	2011财富(亿元)	总部	行业
27	陈发树家族	205	新华都	28	260	福建福州	零售、金矿、旅游、酒、房地产
27	周成建家族	205	美特斯邦威	18	320	上海	服装
29	姜滨家族	200	歌尔声学	70	130	山东潍坊	声学及多媒体产品
29	张茵家族	200	玖龙纸业	24	280	广东东莞	环保造纸
31	黄伟、李萍夫妇	190	新潮集团	24	280	浙江杭州	房地产、金融
31	潘石屹、张欣夫妇	190	SOHO中国	37	210	北京	房地产
33	杜双华	185	日照钢铁	26	270	山东日照	钢铁、投资
33	李水荣家族	185	荣盛控股	11	350	浙江杭州	化纤、房地产、物流、投资
35	黄世再家族	180	大中华国际	48	170	广东深圳	房地产、投资
35	荣智健	180	中信泰富	34	220	香港	综合
35	史玉柱家族	180	巨人	42	200	上海	在线游戏、金融、投资
35	魏建军	180	长城汽车	255	63	河北保定	汽车
35	叶立培	180	仲盛	48	170	上海	房地产
40	龚虹嘉、陈春梅夫妇	175	海康威视	58	150	浙江杭州	视频监控产品
40	王玉锁、赵宝菊夫妇	175	新奥	48	170	河北廊坊	天然气、能源化工、房地产、生物制药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平面图





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河仁楼251室, 210023

电话: 025-89680964

邮箱: hrca@nju.edu.cn

网站: <http://sociology.nju.edu.cn>